

WORLD AGRICULTURE

世界农业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核心期刊
-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 ★中国农林核心期刊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一批认定学术期刊
- ★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全文收录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主办单位**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指导单位**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  
**协办单位**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农业行业分会)  
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刊名题字：吴作人  
1979 年创刊  
月 刊



世界农业编辑部  
微信公众号

总字第 533 期  
2023 年第 09 期

# 世界农业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马有祥

副 主 任 (按姓氏笔画为序)

广德福 马洪涛 朱信凯 刘天金 杜志雄 何秀荣 张陆彪 顾卫兵 隋鹏飞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林萍 韦正林 仇焕广 孔祥智 叶兴庆 司 伟 吕 杰 朱 晶 朱满德 刘 辉  
刘均勇 李先德 李翠霞 杨敏丽 吴本健 宋洪远 张林秀 张海森 张越杰 陈昭玖  
陈盛伟 苑 荣 苑 鹏 罗小锋 罗必良 金 轲 金文成 周应恒 赵帮宏 赵敏娟  
胡冰川 柯文武 姜长云 袁龙江 聂凤英 栾敬东 高 强 黄庆华 黄季焜 程国强  
蓝红星 樊胜根 潘伟光

主 编 刘天金

副 主 编 苑 荣 张丽四

执行主编 贾 彬

责任编辑 卫晋津 张雪娇 李 辉

编 辑 吴洪钟 汪子涵 陈 璠 程 燕

SHIJIE NONGYE

出 版 单 位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 刷 单 位 中农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 782 信箱)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

邮 编 100125

出 版 日 期 每月 10 日

电 话 (010)59194435/988/990

投 稿 网 址 <http://sjny.cbpt.cnki.net>

官 方 网 址 <http://www.ccap.com.cn/yd/zdqk>

定 价 28.00 元

广告发布登记:

京朝工商广登字 20190016 号

ISSN 1002 - 4433

CN 11-1097/S

◆凡是同意被本刊发表的文章,视为作者同意本刊将其文章的复制权、发行权、汇编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转授给第三方。特此声明。

◆本刊所登作品受版权保护,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在农村发展的整体层面促进农村就业：国外经验与启示	谢秋山 许源源 (5)
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特征、原因、影响及应对	黄 静 肖小勇 (18)
风险规避 VS 风险偏好：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影响了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吗？	何邦路 吴秀敏 吉 锐 等 (31)
日本与非洲的国际农业合作及其启示	李国辉 (45)
农业多功能性发挥：日本的实践经验及其启示	刘 文 梅 冬 彭建仿 (55)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农产品贸易规模变动的驱动因素研究	张雅茜 曹 冲 布炳鹤·阿布拉 (64)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村级债务的现状、成因与化解机制	周静毅 (73)
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	王 伟 毛 伟 (82)
规模化经营主体能引领小农户化肥减量吗？ ——基于外部性视角分析	高孟菲 潘 瑞 纪月清 (97)
数字金融、风险偏好与农户创业行为 ——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分析	赵天宇 张士云 (110)
其他	
国际粮农动态：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大使出席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阶段成果总结推进大会等 2 则	(123)
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与贸易形势月报（第 22 期）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预警救济专家委员会 (125)
2023 年 8 月世界农产品供需形势预测简报	赵可轩 (129)
农业贸易百问：美国农业生产具备哪些优势？	郝晓燕 柳苏芸 (135)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 促进食物系统转型 ——第七届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大会综述	李静怡 焦雯璐 闵庆文 (137)

- Promoting Rural Employment at Overall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Policy 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s from Other Countries  
 ..... XIE Qiushan, XU Yuanyuan (5)
- The New Round of International Food Price Rise: Characteristics, Causes, Effects and Countermeasures  
 ..... HUANG Jing, XIAO Xiaoyong (18)
- Risk Aversion vs. Risk Preference: Does the Risk of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Host Countries Influence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 HE Banglu, WU Xiumin, JI Rui, et al (31)
- Japan's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and Its Enlightenment  
 ..... LI Guohui (45)
- Develop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e: Japan's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 LIU Wen, MEI Dong, PENG Jianfang (55)
- Study on Driving Factors of China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Scale Change under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 ZHANG Yaxi, CAO Chong, BU Wajian (64)
- The Status, Causes and Resolution Mechanisms of New Village-level Deb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 ZHOU Jingyi (73)
-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rivate Capital in Agriculture on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 WANG Wei, MAO Wei (82)
- Can Large-scale Business Entities Influence Small Farmers to Use Less Fertilizer?  
 —Analysis From the Externality Standpoint  
 ..... GAO Mengfei, PAN Rui, JI Yueqing (97)
- Digital Finance, Risk Preference and Farmer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FS Data  
 ..... ZHAO Tianyu, ZHANG Shiyun (110)

# 在农村发展的整体层面促进农村就业： 国外经验与启示

◆ 谢秋山<sup>1</sup> 许源源<sup>2</sup>

(1.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湘潭 411105;

2.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长沙 410075)

**摘要：**促进农村就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维持乡村交换系统功能的重要基础。通过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的对比可以发现，成功的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核心特征是在农村发展的整体性框架下考虑和设计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尤其要重视乡村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对就业的支撑功能；同时，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与人口结构的变化，要将农村就业促进的目标定位于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而非仅仅定位于扶贫或提供基础性生存保障，并不断推动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创新。借鉴国外经验，国内农村就业促进政策要在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总体导向下，兼顾“就地就近就业”和“外出转移就业”的双重目标，基于农村发展乃至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大局进行整体性政策设计，并重点支持立足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数字化就业岗位的开发。

**关键词：**农村就业；农村发展；高质量充分就业；数字化就业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3.09.001

## 1 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0年，中国仍有约5.1亿人口生活在乡村，仍有约2.88亿劳动力人口在乡村就业。这部分劳动力人口能否在农村乃至县域就地就近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不仅事关这部分劳动力人口及其家庭的美好生活，也在宏观上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和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同时，这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和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根本所在。

农村居民美好生活的实现离不开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持续支持。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尤其是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新一代农村劳动力，他们对未来生存发展有着更高的期待，这些更高水平期待的满足需要建立在个体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基础之上。但实践中，这部分乡村从业人口，乃至在县域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就业状况却不容乐观。县

收稿日期：2023-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农村贫困妇女非农就业服务研究”（18BZZ100），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湖南省返乡农民工就业质量评价及其提升路径研究”（19A468）。

作者简介：谢秋山（1981—），男，内蒙古赤峰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发展与政策、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政策，E-mail: feather3891@126.com；许源源（1974—），男，湖北黄梅县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地方治理、农村反贫困，E-mail: xuyy4791@163.com。

域里不仅就业机会偏少,而且就业收入水平偏低,难以满足他们在农村乃至县域体面生存发展的需要。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也显示,在就业收入增速方面,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本地农民工,明显低于在城镇就业的外出农民工(图1)。因此,有必要构建更具针对性的农村就业促进政策,支持他们通过高质量充分就业来实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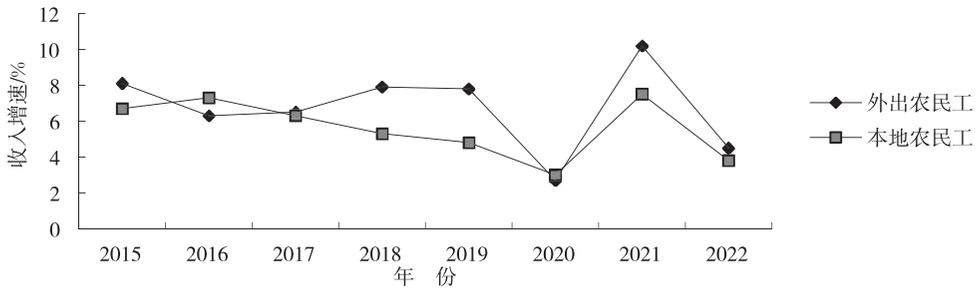


图1 2015—2022年外出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收入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乡村全面振兴,乃至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都离不开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支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支撑。然而,现实中,无论是乡村政务治理、教育医疗服务提供,还是乡村产业发展所需人才都极度缺乏,且存在“引不来”“留不住”的难题。以《半月谈》记者调查过的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木瓜坪乡康家湾村为例,该村近1300人,约70%的人都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主要是老人,60岁及以下的仅七八十人<sup>[1]</sup>。总之,伴随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中国农村地区正在经历从本地劳动力过剩到本地发展所需劳动力短缺的历史转变之中,急需进一步优化农村就业促进政策,通过更有创新性的精准政策支持,吸引和留住一定规模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人才,为乡村振兴和县域城镇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离不开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大力支持。虽然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历史性地得到解决,但中国农村发展依然落后,巩固农村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十分艰巨,贫困人口返贫或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依然存在。从根本上看,要阻断返贫风险,有劳动能力的农村脱贫人口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取稳定的、相对可观的收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把“聚焦产业就业”作为“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举措。为此,有必要创新农村就业促进政策,以更好地提升脱贫劳动力的就业质量,通过高质量就业增强他们的内生发展能力和反贫困能力。

总之,不论是满足农村劳动力个体及其家庭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还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都需要进一步优化农村就业促进政策,以更好地服务于“三农”发展的大局。在世界范围内,既有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而苦苦探索,也有如欧盟、加拿大、英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为就业岗位空缺、农村产业发展无可用劳动力而发愁。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针对农村就业领域存在的问题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也必然会对优化中国农村就业促进政策提供一定借鉴。

## 2 文献综述

在实践中,农村就业促进政策与发展中国家扶贫紧密相连,无论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机构,还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都采取了很多措施促进农村地区就业,但学界针对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研究却并不多见。

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国外研究者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存在的不足与实践效果。Fernandes<sup>[2]</sup>、Bhagwa<sup>[3]</sup>的研究都发现,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就业促进项目存在可持续性较差及实践

效果有限的问题。Panda<sup>[4]</sup>、Manning<sup>[5]</sup>分别对印度和加纳农村就业促进政策中的制度安排缺陷及其引致的不利后果进行了分析，认为就业促进政策创造的非农就业岗位主要在城镇，农业就业岗位反而减少了。Dev<sup>[6]</sup>、Pooja 和 Ashok<sup>[7]</sup>的研究从公共预算角度来审视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存在的不足，认为印度现有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预算分配尚不足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进一步向农村就业促进倾斜。Khera 和 Nandini 关注了农村就业促进政策效果的性别差异，认为就业促进项目增加了女性获得本地工作的机会，但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公依然存在<sup>[8]</sup>。

国内研究者多把研究对象聚焦高校毕业生，致力于分析大学生返乡就业面临的阻力和构建促进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的对策<sup>[9-10]</sup>。同时，也有研究者对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工具存在问题进行了探讨。汪雯等建议强化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应用<sup>[11]</sup>。王霆和李洋主张强化对作为需求性政策工具的“畅通农民工维权通道”政策和作为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加强农民工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保护”政策的使用<sup>[12]</sup>。此外，程又中等<sup>[13]</sup>、杜丽华<sup>[14]</sup>还专门对国外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就业和促进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政策经验进行了梳理。

简而言之，既有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了国外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效果、国内农村就业政策工具的使用、国外农村转移就业经验问题，尚未有研究系统梳理发达国家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经验，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比较的视野下系统总结国外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经验启示；同时，已有经验梳理都缺乏对近二十年国外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经验的梳理和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在综合梳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村就业促进经验的基础上，重点总结近二十年来世界各国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经验，并探讨其对优化国内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启示意义。

### 3 发达国家和地区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经验与效果

承前所述，促进农村就业，尤其是支持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意义重大。但受农村地区就业机会偏少、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相对偏低等多重不利因素制约，促进农村就业工作还面临诸多困难，往往存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也正是因为如此，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依然十分重视农村就业促进问题，并把农村就业促进与农村整体的发展联系起来。

#### 3.1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在农村发展的整体框架下促进农村地区就业

欧美发达国家认为，普遍存在的农村衰败，根源于农村社区场景下形成的发展恶性循环。一般来说，农村衰败起始于农村社区人口的流失、人口老龄化以及距离市场和服务较远，而这些特征引致的结果就是农村较低的人口密度。农村低人口密度会使得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的群聚效应消失，而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群聚效应的消失也就意味着，在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和质量较差，这进一步影响了农村地区企业创新创造的活力，其直接结果就是较低比例的农村商业创新创造。低水平的农村商业创新创造意味着，低水平的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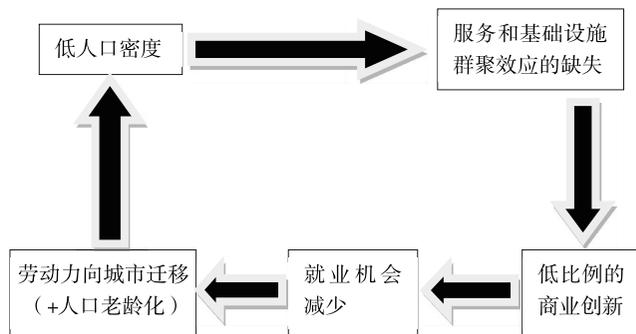


图2 农村衰败的循环

注：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相关文件汇总整理。

利润机会，它会进一步导致农村地区就业机会的减少。农村地区就业机会的减少则进一步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而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和人口老龄化的共同作用下，农村人口流失会更加严重……循环往复，农村地区就逐渐走向衰败（图2）。

基于上述关于农村发展各要素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认知，发达国家和地区更多的是在农村发展的整体框架

下看待农村就业促进问题。农村发展至少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四个层面的内容。在经济发展层面,通过引导产业发展,农村要保有一定的高质量市场机会,尤其是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进而保证农村人口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发展层面,农村社会不仅要稳定,更要保持接近城市水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以充分发挥农村作为城乡资源交换系统的功能和满足部分人口在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在环境发展层面,要建设“美丽宜居”农村,让农村居民安居乐业,还要让农村成为城市居民亲近自然、体验田园生活、放松身心之所;在文化发展层面,乡村特色文化不仅是满足人们“乡愁”的“刚需”,还是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引进来”“留下来”农村发展所需人才的关键。相应地,在农村发展整体层面下的农村就业促进政策,会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可持续全面发展的目标或前提下,促进农村地区或农村劳动力就业,而非单一聚焦农村劳动力就业。

在宏观视角下,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大同小异,均重视在农村发展的整体层面促进农村就业。但在具体政策举措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综合考虑国情差异、政策侧重点差异和资料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进行区域性整体决策的欧盟、劳动力人口极其稀少且农村地区资源丰富的加拿大、高度重视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英国、资源稀缺且人多地少的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典型。

### 3.1.1 欧盟:以农村再振兴在农村创造高质量充分就业机会

虽然,欧盟各国城镇化水平都较高,但截至2021年,欧盟各国依然有接近1.11亿人<sup>①</sup>、约2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如何让如此规模的农村人口高质量就业,一直是欧盟委员会关心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来,伴随欧盟各国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失业率居高难下(图3),欧盟委员会更是把促进劳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于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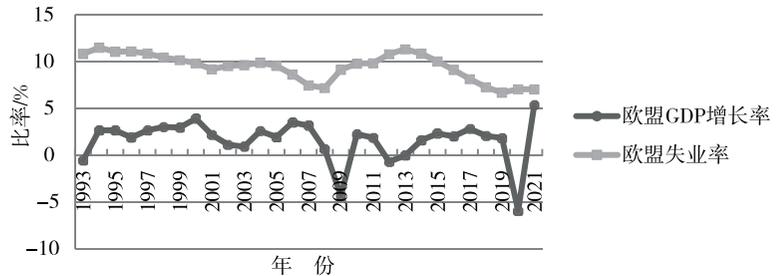


图3 1993—2021年欧盟GDP增长率和失业率变化

数据来源: Macrotrends。

为了在农村发展的整体性框架下促进农村就业,欧盟进行了充分的论证。2019年12月,欧盟委员会专门组织了一个主题为“充满生机的农村地区:农村就业”的研讨会,专门探讨欧盟农村就业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sup>②</sup>。研讨会上,形成了“利用公共支持促进农村就业”“利用青年创业带动农村就业”“通过整体性政策和更有针对性的干预创造就业机会”等一系列关于促进农村高质量就业的政策倡议<sup>[15]</sup>,并且这些政策倡议在之后的“欧盟农村地区远景规划”中得到体现。

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6月启动的“欧盟农村地区远景规划”,旨在通过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强化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建设在农村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力争在2040年前推动欧盟农村再振兴。欧盟“农村再振兴”计划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以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强化公共服务供给的“强大农村”计划;二是以改善公共交通服务和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手段的“畅通农村”计划;三是以保护自然资源和修复农村景观为主要手段的“韧性农村”计划;四是以农村经济多元化,尤其是商业繁荣为主要手段,致力于促进农村就业和农业发展的“繁荣农村”计划。为了推进欧盟农村再振兴,欧盟主要推进两大旗舰工程——“农村协议”和“欧盟农村行动”计划。其中,“欧盟农村行动”计划明确把“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开发与改进农村劳动力技能”作为重要行动目标<sup>[16]</sup>。

可见,欧盟是通过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公共服务、加强环境保护和促进商业经济繁荣等手段,把促进农村就业与农村再振兴结合起来,并在农村振兴发展的整体层面促进农村就业。同时,适应数字化发展趋

① 资料来源: <https://www.macrotrends.net/countries/EUU/european-union/rural-population>。

② 资料来源: [https://enrd.ec.europa.eu/news-events/events/enrd-workshop-vibrant-rural-areas-rural-jobs\\_en](https://enrd.ec.europa.eu/news-events/events/enrd-workshop-vibrant-rural-areas-rural-jobs_en)。

势，欧盟在促进农村全面发展的过程中，还特别重视数字信息技术的驱动作用，进而确保农村就业岗位吸引力，形成了“以数字技术驱动农村再振兴，以农村再振兴保障农村就业”的基本模式。

### 3.1.2 加拿大：以农村发展的整体性决策，确保就业促进的核心地位

与绝大部分国家一样，加拿大农村地区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加剧、青年劳动力人口持续减少的困境。在2001—2016年，加拿大超过7%的就业岗位增加来自农村社区。但与此同时，留在加拿大农村地区的15~19岁人口数量却减少了10%。更为严重的是，2001—2016年，加拿大农村地区潜在劳动力人口数量从1 475 220人下降到1 131 830人，降幅为23.3%；潜在退休人口数量则从1 015 940人增加到1 701 540人，增幅达到40.3%<sup>[17]</sup>。可见，加拿大农村地区产业发展所需劳动力非常缺乏。为此，加拿大政府在制定农村发展政策时注重把农村产业发展需要与劳动力就业结合起来，注重在农村社区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

在政策制定与协调层面，加拿大政府在农业和农产品部下设了农村秘书处来负责全国的农村政策制定；同时，由农业和农产品部部长亲自负责，通过一个农村问题的跨部门工作小组来协调所有可能影响农村地区的联邦机构，进行整体性协调和运作。

在具体操作层面，加拿大政府于1998年启动了“农村镜像”（Rural Lens）项目。“农村镜像”实际上就是一个农村优先发展事项的政策清单，由决策部门决定每年度或每个时期农村要优先制定哪些政策，或优先开发哪些项目。加拿大农村就业促进项目也就是在这样的整体性政策框架下和项目建设框架下得以推进的。起始于1986年的“社区未来项目”（Community Futures Program）本身就是“加拿大就业战略”<sup>①</sup>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初始的目标就是解决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严重失业问题，并为该项目确立了农村发展的导向<sup>[18]</sup>。2019年，加拿大新制定了“加拿大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来为加拿大农村社区和偏远社区创造就业机会。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加拿大政府在“加拿大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中专门列出了“加拿大农村和北部社区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重点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为农村地区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sup>[19]</sup>。农村、工作和增长、网络连接、住房、技能、旅游业等与农村就业创业活动相关的要素均是“加拿大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文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 3.1.3 英国：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中心，大力支持农村发展

与欧盟和加拿大在农村发展整体框架下为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的做法不尽相同，英国以促进劳动力在农村高质量充分就业为中心，支持农村发展。二者均采用整体主义思路，但也存在明显区别：前者的核心定位是农村发展，后者的核心定位是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

以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核心制定全面农村发展计划，是英国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显著特征。在英国首相的支持下，英国地方政府协会下属的英国服务网络组织（Rural Services Network）于2020年启动一项名为“工作计划的农村镜像审查：保护、支持和创造工作岗位”的农村就业促进计划。该计划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素：一是支持工作（Supporting Jobs），主要服务于学徒、短期支持性就业和工作搜寻活动，具体指的是提供学习、雇用、工作实习机会等“一揽子”支持措施，尤其是为16~24岁的青少年就业和实习提供帮助和支持；二是保护工作（Protecting Jobs），主要服务于旅游、住宿和酒店服务部门，指的是支持酒店和休闲娱乐部门的“一揽子”财政支持措施；三是创造工作（Creating Jobs），指的是旨在激励和抵消住房市场影响的“一揽子”财政措施。上述三个方面核心要素涵盖了农村就业机会创造、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产业扶持、住房支持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有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具体来看，由英国首相发起的农村工作计划包括九项重点措施：一是为了留住农村建筑行业工人的“建筑人才保留”计划；二是通过公共部门建筑投资，为农村建筑部门及相关产业链创造就业机会的“公共部门脱碳”计划；三是通过环保生态的景观和土地使用支持农村商业发展的“绿色就业挑战基金”；四是旨在促

① 加拿大政府发起的“加拿大就业战略”起始于1985年9月，它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以前的就业战略：一是聚焦农村和北部地区最需要帮助的人群；二是通过授权地方，强调服务支持的精准性。

进社会房屋投资的“社会房屋脱碳基金”；五是旨在让农村居民和就业者安心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经济适用房计划”；六是以农村发展，尤其是以便利人民在农村社区生活为目标的“规划改革”；七是以增强农村学校独立发展潜力为目标的“学校资产基金”；八是以增加地方基础设施水平，尤其是以提高农村社区的数字连接程度为目标的“地方建设工程”；九是以增强小规模农村服务中心经济发展活力为目标的“小城镇发展基金加速工程”。这九个方面的措施在为农村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兼顾乡村产业链、乡村人才引进、乡村环境保护、乡村劳动者和居民住房、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农村治理问题。

同时，英国的农村工作计划还针对失业风险较高的产业给予专门的政策支持。比如，英国政府通过统计发现，以住宿餐饮服务业、艺术休闲娱乐业为代表的旅游和酒店相关行业是农村发生失业或待岗情况最严重的行业，于是就通过“保护工作措施”给予相关行业“一揽子”财政支持计划，以确保留住相关农村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人才。

### 3.1.4 日本：以“六次产业化”和“乡愁远程办公”，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

#### (1) 以“六次产业化”在农村创造高质量充分就业机会

可持续的农村发展，应该是依托农村地域资源的发展。日本经过长期的探索认识到，无论是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是留住乡村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劳动力，都必须立足于农村地域资源产业，进而探索出通过“六次产业化”促进农村就业的新思路。“六次产业”指“一次产业+二次产业+三次产业”，也指“一次产业×二次产业×三次产业”，强调的是立足于第一产业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它通过让农村劳动者兼顾农产品加工销售和服务的方式，在农村创造了大量的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机会，还有效提高了劳动力在农村就业的质量，尤其是有效地增加了劳动力在农村就业的收入。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伴随农村过剩劳动力的消失，无论是城市工业聚集区，还是农村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都开始出现短缺，日本政府曾经通过《二次雇用对策基本计划》《农村地区引进工业促进法》《工业再配置法》等法律和政策，推动工业向农村转移，在农村实现工业发展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融合。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以造船、纤维、矿业为代表的制造业陷入萧条，部分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大量失业人口，日本政府制定了《地区雇用开发等促进法》，推进雇用机会扩大政策，并将《农村地区引进工业促进法》的支持对象扩展到运输、仓储、包装、批发等行业，并将“六次产业化”纳入雇用开发的行业。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农村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重，日本农村工业迅速衰退，“六次产业化”的发展思路迅速被政府所采纳。日本政府先后出台了《促进中小企业者和农林渔业者联合开展事业活动相关法》《利用地域资源的农林捕鱼业者创造新事业以及利用地域农林水产物的促进相关法》《促进农村地区产业导入相关法》等法律法规。通过在农村推进“六次产业化”，重点在农村发展地域资源利用型产业<sup>[20]</sup>，尽可能地让农村劳动力技能与农村资源结合起来，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农村社区实现充分就业，并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和“骨干缺乏”的问题。

#### (2) 以“乡愁远程办公”满足返乡劳动力就业需求

为了顺应人们因“乡愁”而返乡的愿望和应对疫情持续的影响，日本还采取了另外一项新举措来促进农村就业——积极开发“乡愁远程工作岗位”（Furusato Telework）。乡愁远程工作项目由日本总务省主导推行，旨在鼓励城市大公司和返回家乡的农村劳动力合作，让农村劳动力在家乡获得工作机会。日本政府推行这个项目的初始目标人群是其父母在农村且年事已高的大龄劳动力和接近退休年龄的大龄劳动力。他们因为家庭生活平衡需要或乡愁的需要，需要在农村就业创业。

日本的“乡愁远程办公”就业模式分为三种：一是“家中办公模式”，针对在农村家中有适宜办公场所的劳动者。政府只需与城市大公司进行沟通或者发出倡议，支持城市大公司与需要在农村居住的劳动者直接进行合作，开展远程办公。二是“共享办公模式”，服务对象是那些农村家中没有适宜办公场所的劳动者。具体做法是，由政府出面在全国各地农村寻找可用建筑，改造成共享办公室，供那些家中不适宜办公的劳动者远程办公使用。三是“乡愁招募”，主要针对地方社区的劳动者。它主要指的是农村企业有意识地招募那

些在本地社区的劳动者，在本地企业进行远程办公，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聘用居住或迁移到企业周边的劳动者<sup>①</sup>。

### 3.2 发达国家和地区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显著效果

综上所述，发达国家采取了诸多举措来促进农村就业，这些就业促进政策大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在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激励下，欧盟绝大部分国家农村就业都保持着较好的势头。比如，在 2021 年第一季度到 2022 年第二季度的十多年时间里，欧盟农村就业率整体呈现稳步增长趋势，总计增长了 6.1%<sup>[21]</sup>。截至 2021 年底，欧盟农业生产部门雇用了 2 200 万名劳动力，食品生产链条上（包括农业、食品生产、零售及相关服务行业）提供了大约 4 400 万个工作岗位<sup>[22]</sup>，较好地缓解了农村衰败的趋势，为农村地区再振兴留住了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单以可以获得数据的法国为例，2014—2020 年，法国农村失业率持续下降，且同样明显低于城镇（表 1）。相应地，绝大多数欧盟国家农村人口的流失率都较低，甚至有些国家农村人口还呈现增加趋势，比如，2012 年，比利时、冰岛、法国的农村人口分别增长了 7.9%、3.4%、5.3%，当年的农村失业率仅为 4.7%、7.2%、5.2<sup>[23]</sup>。

表 1 2014—2016 年法国城乡失业率对比

失业率	2014 年	2016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城镇失业率	11.3	11.1	10	9.4	8.8
农村失业率	6.8	6.7	5.8	5.2	5.5

数据来源：<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753636/unemployment-rate-by-geographical-area-france>。

近年来，加拿大农村就业人数也稳步增长，且失业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较好地保障了农村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供给。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网站（Statistics Canada）数据，近几年来，加拿大农村地区就业人数总体呈增加趋势，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并且失业率水平明显低于都市区（表 2）。

表 2 2018—2022 年加拿大城乡就业人数与失业率对比

项目	地区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就业人数/千人	都市区	16 088	16 505	15 635	16 492	17 141
	农村	1 217	1 224	1 191	1 297	1 313
失业率/%	都市区	5.7	5.6	9.8	7.6	5.3
	农村	4.8	4.8	8.4	5.5	4.4

数据来源：Statistics Canada。

当然，作用效果更为明显的还是英国。根据 2022 年 8 月发布的《英国农村统计摘要》，2011—2019 年，英国农村失业率从 5% 下降到 2.6%，即使受到疫情的冲击，2020 年英国农村失业率也只有 3.5%。

在日本，在“六次产业化”政策和“乡愁远程办公”的共同作用下，农业生产和渔业生产从业者人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很好地起到了预防农村劳动力流失的作用。农业生产从业者人数由 2010 年的 39.95 万人增加到 2018 年的 44.15 万人，并在 2016 年达到峰值 47.12 万人；渔业生产从业者人数则由 2011 年的 1.82 万人增加到 2018 年的 2.95 万人。受疫情影响，2019 年和 2020 年这两项数据略有下降，农业生产从业者人数分别为 43.77 万人和 40.19 万人，渔业生产从业者人数分别为 2.95 万人和 2.91 万人（图 4）。

① 资料来源：<https://we-xpats.com/en/guide/as/jp/detail/5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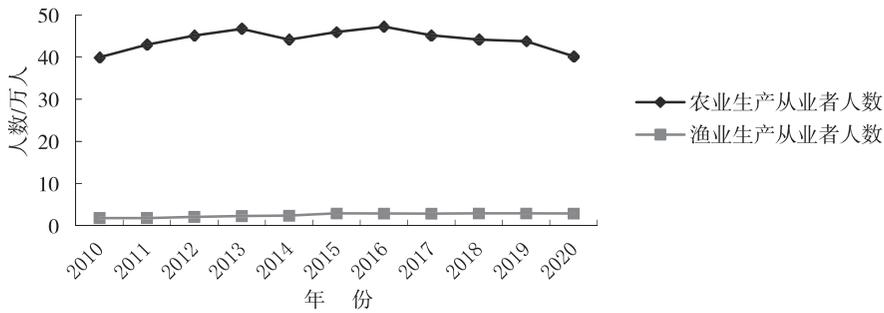


图4 2010—2020年日本农业和渔业生产从业者人数变化

数据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的《6次産業化総合調査》。

## 4 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及成效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经验，已有研究多聚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sup>[13]</sup>。但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促进农村就业的目标不仅定位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尝试在农村社区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提供支持。最为典型的是印度。与中国一样，印度农村劳动力人口众多、大国小农。迫于巨大的就业压力，印度政府历来重视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推进。

### 4.1 印度的经验：以扶贫减贫为中心，致力于提供就业机会

概括起来，印度的农村就业促进措施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以服务城镇劳动力为核心，正规的农村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缺失；二是以扶贫减贫为中心，重在提供基础性安全保障网；三是通过资助小微和中小企业创新创业促进农村就业。

#### 4.1.1 以服务城镇劳动力为核心，正规的农村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缺失

在“制造印度”“技能印度”“数字印度”的雄心目标下，近年来印度发起了“国家职业生涯服务”（National Career Service）建设运动，旨在取代原有的国家就业服务体系，并把原有的就业服务机构升级为职业发展中心<sup>[24]</sup>。但是，这项运动主要定位于城市范围之内，农村就业创业服务很少能进入国家政策的视野。正如印度劳动与就业部和就业总局在2019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来自农村的求职者会发现他们很难在职业介绍所进行登记，因为职业介绍所都坐落在城市”<sup>[25]</sup>。

在农村，以《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The Mahatma Gandhi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为代表的印度农村就业创业支持项目也主要是通过为贫困农村家庭提供一份临时工作来缓解他们的生计困境，并不是从人的发展的高度来为农村劳动力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由此可见，印度有农村就业创业支持项目，而无正规的农村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后者是一个以人民的劳动就业需求乃至全面发展需要为目标的、长期的、包括多方面内容的服务供给体系；前者则仅仅是为了让农村居民糊口的权宜之计。

#### 4.1.2 以扶贫减贫为中心，重在提供基础性安全保障网

印度没有明确的农村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不代表印度没有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由于农村人口规模庞大，而且贫困人口比重较大，印度政府的农村就业创业政策与支持举措不得不与扶贫减贫相联系，即农村就业创业政策目标更多地定位于缓解农村贫困，为贫困劳动力家庭提供就业岗位，以让其能够免于饥饿。作为印度农村就业促进的最核心项目——《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设计的初衷也是假定在政府最低工资水平上，每一个村庄都有很多穷人需要工作机会，并且该就业保障项目最初选定的扶持对象也是200个最落后地区的贫困劳动力<sup>[26]</sup>。这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农村发展的整体层面促进农村就业的做法截然不同。也正是因为如此，印度农村就业创业支持政策和服务留给我们的更多是警示——优化农村就业创业服务体系要在整体上聚

焦综合目标，而不能仅仅定位于扶贫或者是解决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

在具体举措方面，当农村社会出现就业机会不足或农民家庭面临生存苦难的时候，印度政府都会在推进修水池、修灌溉渠道、修公路、修寺庙等公共工程和相关的社区层面工程项目时，重点为贫困劳动力和弱势群体提供工作机会，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sup>[26]</sup>。

#### 4.1.3 通过资助小微和中小企业创新创业促进农村就业

把就业保障项目与小微和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结合起来，尤其是与信贷资金支持项目联系在一起，是印度农村就业促进的又一个突出特征。该举措意在充分调动农村创新创业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带动作用。在 20 世纪末，印度专门启动了“信贷链接资本补助项目”（Credit Linked Capital Subsidy Scheme）以提供预付资本和财政支持补贴给城乡的小微和中小型企业进行技术革新。该项目的主要支持对象就是城乡刚起步的创新创业者。资助额度为 5 万~2 000 万卢比，采取全程网上申办的方式，只要提供相关资质文件，几个工作日内就能审批通过。该项目实施过程中虽然出现过波动，但整体上该项目资助的资金规模和创新创业者人数都呈现明显的增加趋势（表 3）。

表 3 印度“信贷链接资本补助项目”资助城乡小微和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情况

年份	资助小微和中小企业数量/个	补贴发放额度/十万卢比
2004—2005 年	14	11.60
2005—2006 年	74	167.62
2006—2007 年	90	201.12
2007—2008 年	24	77.18
2008—2009 年	178	775.80
2009—2010 年	97	447.08
2010—2011 年	206	1 116.88
2011—2012 年	82	495.87
2012—2013 年	225	1 399.47
2013—2014 年	187	1 219.91
2014—2015 年	86	633.56
2017—2018 年	4 081	26 000.44
2018—2019 年	14 155	98 000.33

数据来源：Corpseed。

## 4.2 印度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效果

从最终效果来看，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就业促进项目并不算成功，因为这些就业促进项目不仅惠及面有限，而且绩效一般。

对于印度而言，肇始于 2005 年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被他们自己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最有雄心壮志的农村发展计划，它为超过 500 万名缺乏学历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sup>[27]</sup>。但它的实际效果令人质疑。比如，2011—2012 年，印度《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项目在任何一个邦均未能实现“为至少 50% 的项目参与家庭提供超过每财政年度 100 天以上的最低工作保障”的目标<sup>[27]</sup>。

更为严重的是，《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项目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的总体绩效呈现下降趋势。如表 4 所示，在每人时数财政支出和总支出保持稳中有增和发放就业卡数量逐步增加的情况下，该就业保障项目所创造的工作岗位总人数却从 2009—2010 年开始呈下降趋势，低种姓人群受益比例也呈明显下降趋势。这就意味着，印度的农村就业保障项目不仅总体效率较低，公平性也越来越差，连最初设定的扶贫目标也未能很好地完成。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印度国家就业政策声称要为包括在册种姓和在册部落在内的边缘群体提供平等的高质量就业机会，但是考虑到印度社会阶层的差异，劳动就业市场上的社会排斥和就业歧视现象仍然较为普遍<sup>[28]</sup>。

表 4 《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项目的绩效变化情况

年份	发放就业卡数量/ 百万	工作岗位总人数/ 十亿	低种姓人群占总人数比例/ %	每人时数财政支出/ (美元/天)
2006—2007 年	37.85	0.91	61.81	1.62
2007—2008 年	64.74	1.44	56.71	1.84
2008—2009 年	100.15	2.16	54.72	2.10
2009—2010 年	112.15	2.84	51.20	2.23
2010—2011 年	119.82	2.57	51.48	2.55
2011—2012 年	122.75	2.11	40.20	2.96
2012—2013 年	130.61	2.30	40.01	2.66
2013—2014 年	130.57	2.30	42.47	2.69
2014—2015 年	123.03	1.60	40.39	3.32

数据来源: Verma Shilp & Shah Tushaar (2018)。

注: 印度的低种姓人群指在册种姓或在册部落人群。印度政府将约 30% 的印度人列为先进种姓, 其余约 70% 则属于在册种姓或在册部落。

与此同时, 这种扶贫导向的就业创业支持, 难以满足青年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群体的就业创业需求。“即便《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项目和农业可以为所有农村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 受过教育的失业年轻群体也更倾向于流动到城市地区就业或者从事非农工作”<sup>[28]</sup>。因为, 现在印度政府为农村劳动力提供的工作机会不仅工作条件艰苦, 而且收入较低, 难以带来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也正是因为如此, 印度政府在农村发起的就业保障项目难以阻止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求机会, 进而进一步加剧了印度城市的失业水平。

## 5 国外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的启示

通过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经验的比较, 不难看出, 发达国家和地区与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农村就业促进政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也带来了明显不同的效果(表 5)。发达国家和地区立足于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 在农村发展的整体层面促进农村就业, 并根据农村人口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式变化不断进行政策创新, 这是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所欠缺的。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就业促进政策经验, 对于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国内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

表 5 各个国家与地区就业促进政策特征与效果的比较

国家/地区	政策目标	政策视角	政策创新	政策效果
欧盟	高质量充分就业	农村再振兴	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促进农村发展	就业率稳步增长、人口流失率保持较低水平
加拿大	高质量充分就业	以产业和就业为核心的农村发展	重视吸引外来优秀劳动力	就业规模稳步增加, 保障了劳动力供给
英国	高质量充分就业	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中心的农村发展	把教育、金融、环境与就业创造相融合	较低的失业率
日本	高质量充分就业	以农村资源充分利用为中心的农村发展	开发远程就业岗位、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农业和渔业从业者人数增加
印度	充分就业	以扶贫为中心促进农村就业	无重要创新	效果有限且公平性较差

注: 作者根据前文论述自制。

### 5.1 要在农村发展的整体性视角下促进农村就业

发达国家政府普遍认识到, 农村就业与农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不可分离, 甚至与整个农村的繁荣发展密切相关。无论是欧盟委员会和加拿大以农村发展项目为依托在农村为劳动力创造就业

机会，还是英国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中心大力支持农村发展，抑或是日本以“六次产业化”为农村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是在农村发展的整体性框架下设计农村就业支持政策和优化相应服务供给，其核心是把农村地区就业与整体的农村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整体的政策设计。

当前中国农村地区普遍面临产业发展乏力、高质量就业机会缺乏、劳动力人口流失严重、环境污染严重、传统乡村文化衰落等一系列问题，要充分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教训，在乡村全面振兴框架下，为返乡留乡劳动力创造高质量充分就业机会，而不能简单地把农村就业看作是扶贫工程、兜底工程，要从留住乡村振兴所需优秀人才着手，通过乡村产业、生态、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全面振兴来支持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实现稳定高质量就业。

## 5.2 适应农村发展的整体需要，以支持高质量充分就业为中心促进农村就业

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留住农村发展所需人才的关键。如果像印度一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村就业促进政策仅以扶贫为中心，或仅定位于“通过公共就业项目为穷苦和弱势群体提供社会安全网络”<sup>[29]</sup>，它就难以留住农村发展所需人才。所以，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必须要有更高的目标。这个更高的目标就是，在维持农村基本功能的同时，也要创造机会让一部分劳动力在农村地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当前，中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这不仅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终结，还意味着廉价劳动力供给将逐渐成为历史。与此同时，在乡村振兴利好政策的引导下，大量外出务工劳动力返乡就业的愿望日趋强烈。但返乡劳动力往往参照在城市务工收入来决定在农村的长久去留，进而对返乡就业收入有着较高的预期。在此背景下，农村就业促进政策也要回应这些就业预期变化，注重对高质量就业机会的创造，而不仅仅是满足于让返乡劳动力“有工作可做”。

## 5.3 适应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式变化，不断推动农村就业促进政策创新

保持农村可持续发展，不仅要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中心，还需要适应人口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变化，不断对农村就业促进政策进行适时调整，以满足变化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需求。无论是日本积极开发远程办公模式，还是欧盟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在农村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抑或是英国把农村居民教育、农村环境保护与劳动就业促进相结合，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就业促进政策都是“因时而变”“因势而变”，根据农村可持续发展需要和农村劳动力就业需求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农村就业促进政策。

近年来，伴随着老一代农村劳动力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新一代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主体。但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的劳动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同于父辈，新一代农村劳动力更注重个人工作自主和兴趣。加之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新机会日益增多，他们的选择性也多了很多。为适应乡村建设进入数字驱动发展的新阶段，未来的农村就业政策需要重新聚焦，立足于数字信息技术与乡村产业的深度融合，引导和支持农村劳动力涉猎立足于农业农村资源的乡村数字化融合产业，以提高其就业质量和满足他们工作自主性的需求。

当然，作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为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建设经验，要根据自身特点，有所取舍。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欧美发达国家人口规模较小，往往可以不考虑本国劳动力就业问题，而是从农村繁荣发展的整体性目标出发，通过劳动力移民来增加农村青壮劳动力供给。但这不适合人口规模超级庞大的中国。比如，加拿大的国土面积比中国略大，但截至2021年，加拿大全国总人口却只有3 699.2万人<sup>①</sup>，仅约为中国人口总数的2.62%<sup>②</sup>。中国乡村振兴所需优秀人才的“引进来”“留下来”，需要立足本国农村劳动力实际，且通过

①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网站，具体为36 991 981人。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在2022年2月公布的数据，2021年中国总人口为141 260万人。

在农村创造一定规模的高质量就业机会来实现,而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劳动移民来实现。

第二,欧美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已经完成,其目标是维护农村社区作为城乡交换系统的功能,而中国城镇化水平偏低,尚处于需要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阶段,在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过程中,必须兼顾农村发展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双重目标,并在兼顾双重目标基础上进行审慎的政策选择和服务体系设计。尤其是要从城乡融合发展高度出发,把农村就业促进的目标定位为服务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既要通过整体性农村发展政策设计,支持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农村获得高质量充分就业机会,也要鼓励更多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寻求更高质量就业机会,并支持他们顺利实现市民化。

## 参考文献

- [1] 赵久龙,黄浩铭,谢建雯.寻找乡村引才“强磁场”[J].半月谈,2021(21):73-75.
- [2] FERNANDES D. Implementation of MGNREGA & its impact on rural Madhya Pradesh [J]. Indi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5, 50(3): 505-516.
- [3] BHAGWAN V.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 a Swot analysis [J]. The In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9, 70(1): 139-50.
- [4] PANDA B.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 development practice at the crossroads [J].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015, 50(23): 126-131.
- [5] MANNING C. Rural employment creation in Java: lessons from the Green Revolution and Oil Boom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8, 14(1): 47-80.
- [6] DEV S M. Agriculture and rural employment in the budget [J].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005, 40(14): 1410-1413.
- [7] POOJA S, ASHOK G. Can the budget boost agricultural performance? [J].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005, 40(21): 2136-2141.
- [8] KHERA R, NANDINI N. Women worker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 [J].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009, 44(43): 49-57.
- [9] 彭鹏,候佳萌.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村就业创业的对策研究[J].经济纵横,2021,433(12):123-128.
- [10] 范明,张静雯.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4):67-73.
- [11] 汪雯,张鹏飞,李红勋.政策工具视角下重点生态功能区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政策的文本量化研究[J/OL].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1-14 [2023-04-26]. <https://doi.org/10.13931/j.cnki.bjfu.2022160>.
- [12] 王霆,李洋.农民工就业政策如何促进就业?基于组态视角的定性比较分析(fsQCA)[J].人口与经济,2021,247(4):37-50.
- [13] 程又中,等.外国农村公共服务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05-339.
- [14] 杜丽华.国外促进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的经验及启示[J].世界农业,2009(11):8-10.
- [15] European Network for Rural Development. ENRD workshop on ‘vibrant rural areas: rural jobs’ workshop highlights [EB/OL]. (2019-12-27) [2023-01-26]. [https://enrd.ec.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ws-rural-jobs\\_highlights.pdf](https://enrd.ec.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ws-rural-jobs_highlights.pdf).
- [16] European Commission. A long-term vision for the EU’s rural areas: building the future of rural areas together [EB/OL]. (2022-06-17) [2023-01-03].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new-push-european-democracy/long-term-vision-rural-areas\\_en](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new-push-european-democracy/long-term-vision-rural-areas_en).
- [17] FCM. Rural challenges, national opportunity: shaping the future of rural Canada [EB/OL]. (2018-05-11) [2023-02-03]. <https://fcm.ca/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sources/report/rural-challenges-national-opportunities.pdf>.
- [18] OECD. The new rural paradigm: policies and governance [M].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06: 80-81.
- [19] Office of Infrastructure of Canada. Rural opportunity, national prosperity: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rural Canada [EB/OL]. (2022-08-11) [2023-02-03]. <http://www.infrastructure.gc.ca/pub/index-eng.html>.
- [20] 酒井富夫,等.日本农村再生:经验与治理[M].李雯雯,殷国梁,高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299-302.
- [21] MARIE-LAURE A G, JAMES M. EU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impact, challenges and outlook [EB/OL]. (2021-07-08) [2023-01-11]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1/690711/EPRS\\_BRI\(2021\)690711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1/690711/EPRS_BRI(2021)690711EN.pdf).

- [22] EUROSTAT. Urban-rural Europe-labour market [EB/OL] . (2023-04-14) [2023-04-20] .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SEPDF/cache/112338.pdf>.
- [23] EUROSTAT. Archive: statistics on rural areas in the EU [EB/OL] . (2017-09-20) [2022-12-06] .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oldid=391832>.
- [24] KUMAR S. The national career service of India: an appraisal of a dream that could come true [J] . Indian Journal of Career and Livelihood Planning, 2015, 1 (4): 11-23.
- [25] India Ministry of Labour & Employment Directorate General of Employment. Employment exchange statistics 2019 [R].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Labour & Employment Directorate General of Employment, 2021.
- [26] VERMA S, SHAH T. Beyond digging and filling holes: maximizing the net positive impact of MGNREGA [M] // MADHUSUDAN B, VISWANATHAN P K, RUDRA N M, et al. Employment guarantee programme and dynamic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Indi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 , 2018: 103-130.
- [27] MADHUSUDAN B, VISWANATHAN P K. Introduction [M] // MADHUSUDAN B, VISWANATHAN P K, RUDRA N M, et al. Employment guarantee programme and dynamic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Indi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 , 2018: 1-2.
- [28] NARASIMHA R D, AMARENDER R A, MADHUSUDAN B, et al. Implementations and the dynamics of rural labour markets [M] // MADHUSUDAN B, VISWANATHAN P K, RUDRA N M, et al. Employment guarantee programme and dynamic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Indi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 , 2018: 71-101.
- [29] SURAJIT 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cross social classes in rural India [J] . Social Change, 2019, 1 (49): 132-135.

### Promoting Rural Employment at Overall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Policy 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s from Other Countries

XIE Qiushan XU Yuanyuan

**Abstract:** Promoting rural employment is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maintain the exchange function of countryside. The comparison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rural employment promotion policy suggested that, designing rural employment promotion policy at overall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especiall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support func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on rural employment, is the core feature of a really successful rural employment promotion policy. In the meantime, adapting to the changes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the need of rural development, the aim of rural employment promotion policy should be targeted at helping labors to realize full employment of high quality in countryside, not only at poverty alleviation or basic existence insurance, and governments should innovate rural employment promotion policy continually. Drawn lessons from foreign experience, the paper propose that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design rural employment promotion policies holistically on the basis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even County urban-rural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Meanwhile, helping rural labors to realize full employment of high quality both in countryside and in urban should be the ultimate policy objective. In addition, governments should put more emphasis on developing rural digital employment positions,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Keywords:** Rural Employment; Rural Development; Full Employment of High Quality; Digital Employment

(责任编辑 卫晋津 张雪娇)

# 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特征、原因、影响及应对

◆ 黄 静<sup>1,2</sup> 肖小勇<sup>3</sup>

(1. 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武汉 430205; 2.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物流发展研究中心 武汉 430205; 3.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0)

**摘要：**国际粮食价格在近 60 年里经历了 5 次波动，2020 年以来呈现新一轮上涨。新一轮上涨表现出粮价水平高、品种差异大的特征。本文认为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全球气候异常及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因素叠加共同推高了国际粮价，其中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起主导作用。由于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程度低，且中国粮食进口市场相对稳定，短期来看国际粮价上涨对中国粮食安全影响有限。但受中国钾肥进口量大、重大事件持续演化、国际粮食安全降至低水平等因素影响，长期来看国际粮价上涨仍将对我国粮食安全带来一定压力。为应对国际粮价上涨风险，本文从国内稳产保供、加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监测预警、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培育跨国涉农企业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原因；影响；对策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3.09.002

## 1 引言

2022 年上半年国际粮食价格创纪录高涨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据世界银行数据，2022 年 3—6 月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平均为 162.5<sup>①</sup>，超过历史最高水平（2008 年 4 月的 156.6），7—8 月出现小幅回落，但从 9 月至 2023 年 1 月仍处于高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发出警告，“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饥饿危机”，“在短短两年内，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风险的国家从新冠疫情大流行前的 53 个增加到今天的 82 个，人数由 1.35 亿人增加到 3.45 亿人”<sup>②</sup>。在此背景下，系统分析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特征、原因、影响及措施对于应对国际粮价上涨风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关于国际粮食价格的研究集中在如下方面：一是国际粮食价格波动规律。比如公茂刚和王学真分析了国际粮食价格波动规律，认为 1961 年以来国际粮食价格变动分为四个阶段<sup>[1]</sup>。二是国际粮价上涨原因。比如王学真等认为各国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前期粮食价格波动、粮食供给波动、粮食需求

收稿日期：2023-02-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鲜活农产品社区团购的模式、效率及优化政策研究”（21YJA790063），华中农业大学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阐释专项课题“国际粮价上涨背景下全方位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研究”。

作者简介：黄静（1987—），女，重庆万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农产品市场与贸易。

通信作者：肖小勇（1987—），男，湖北利川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农产品市场与贸易，E-mail: xxy@mail.hzau.edu.cn。

① 数据源自世界银行 Commodity Price Data。该价格指数以 2010 年为基期，按名义美元计算。

②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https://www.wfp.org/emergencies/global-food-crisis>)。

波动和热钱波动<sup>[2]</sup>。三是国际粮价上涨对中国粮食市场的影响。比如韩磊认为国际粮食价格对中国粮食价格具有非对称传导效应<sup>[3]</sup>；顾国达和尹靖华认为国际粮价波动对中国粮食缺口的影响<sup>[4]</sup>；肖小勇等认为国际粮食价格对中国粮食价格存在显著的均值溢出效应，但国际粮价的波动溢出效应在品种间存在差异<sup>[5]</sup>。四是应对国际粮食市场风险的措施。比如丁存振和徐宣国提出提升国际粮食供应链安全风险的治理能力以应对国际粮食市场风险<sup>[6]</sup>，朱晶等提出构建安全、高效、稳定、多元的外部粮源供应体系以抵御国际循环的可能断点<sup>[7]</sup>。

现有文献一方面及时就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的原因及影响给予关注。如孔祥智等<sup>[8]</sup>、李春顶和李娟<sup>[9]</sup>、韩冬和钟钰<sup>[10]</sup>等重点分析俄乌冲突对全球及中国粮食市场的影响，认为俄乌冲突对中国粮食市场存在一定影响。另一方面现有文献提出应对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的措施。比如张红宇<sup>[11]</sup>、李晓云<sup>[12]</sup>等提出人口大国应对全球粮食危机应坚持“以我为主”，从国内稳产保供出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围绕国际粮价进行了深入而有益的探讨，但仍需进一步拓展。第一，现有文献大多针对现实的粮价上涨进行分析，较少从历史视角剖析历次国际粮价上涨；第二，现有文献针对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特征及原因仍缺乏系统剖析，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也需进一步研判。基于此，本文将：第一，回顾近 60 年国际粮价上涨历程；第二，分析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特征及原因；第三，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分析国际粮价上涨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第四，提出应对国际粮食市场风险、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 2 近 60 年国际粮价上涨历程回顾

近 60 年来国际粮食价格经历了 1972—1974 年、1977—1981 年、1994—1996 年、2006—2008 年、2010—2012 年共 5 次典型上涨。下面本文对这 5 次上涨历程进行回顾。

### 2.1 1972—1974 年自然灾害、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导致国际粮价上涨

1972 年全球范围内的干旱导致全球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粮食短缺。1973 年 10 月第四次中东战争触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国际油价上涨导致化肥等农资价格上涨。受全球范围内的干旱影响，大米、大豆和玉米的库存消费比远低于 17% 的国际警戒水平，全球小麦的库存消费比接近国际警戒水平。在此背景下，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从 1972 年的 28.8 上升至 1974 年的 82.6，涨幅达 187%，实际价格指数由 108.3 上升至 219.4，涨幅达 103%（图 1）。分品种看，国际大米价格涨幅最大，国际小麦价格和国际玉米价格次之（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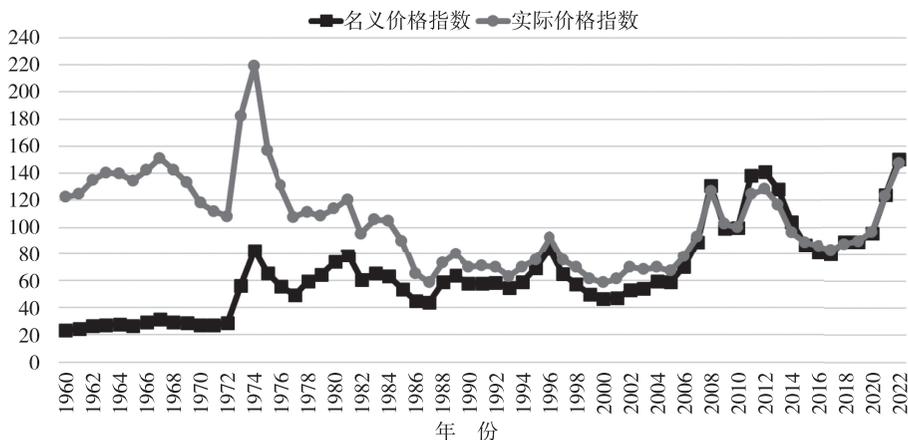


图 1 1960—2022 年国际谷物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图 2 和图 3 同。

注：名义价格指数按 2010 年名义美元计算，实际价格指数按 2010 年美元真实价格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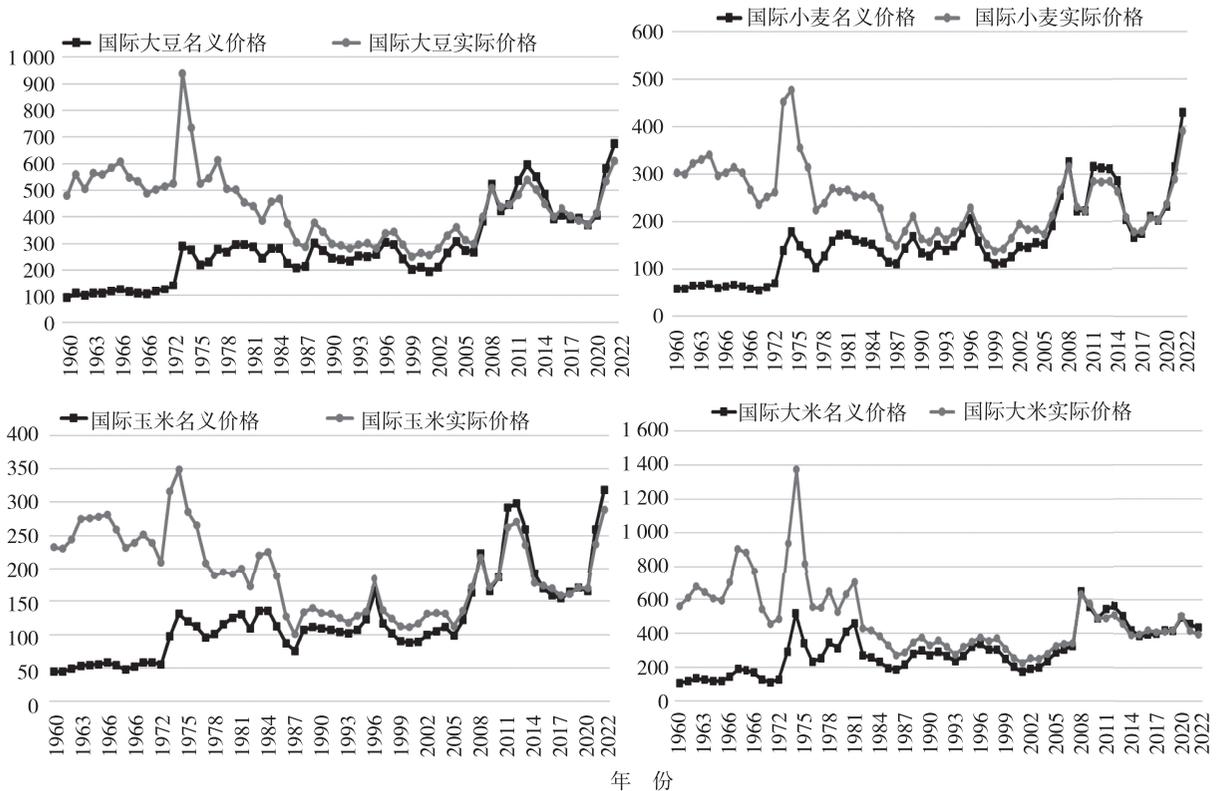


图2 1960—2022年主要谷物国际价格

注：玉米价格为美国2号FOB价格，大米价格为泰国（5%碎米率）大米FOB价格，小麦价格为美国2号硬红冬小麦出口价格，大豆价格为美国海湾2号黄豆价，实际价格按2010年美元实际价格计算，单位：美元/吨，实际价格按2010年美元真实价格计算。

## 2.2 1977—1981年石油危机和经济滞涨引起国际粮价上涨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和欧洲的异常气候导致粮食作物再次减产。1978年伊朗政变、1980年两伊战争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油价高涨带动肥料等农资价格上涨，成为本次国际粮价上涨主因。为应对经济滞涨，美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美元贬值及金融资本过剩推动国际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从1977年的49上升至1981年的79，涨幅达61%，实际价格指数从108上升至120，涨幅为11%（图1）。分品种来看，国际大米价格涨幅较大，国际小麦价格次之（图2）。此轮上涨过程中，国际大米、小麦和玉米的库存消费比均高于17%，仅国际大豆库存消费比低于17%的国际警戒水平（表1）。这表明减产并不是本轮粮价上涨的主因。

## 2.3 1994—1996年农业协定削减粮食出口补贴导致全球粮食减产及国际粮价上涨

1994年4月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协议，国际市场上的关税、非关税壁垒及出口补贴降低1/3，国内支持价格下降1/5，全球粮食产量下降从而推高国际粮食价格<sup>[13]</sup>。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从1994年的59上涨至1996年的84，涨幅达42%，实际价格指数由70上涨至93，涨幅达33%（图1）。分品种看，国际玉米价格涨幅较大，其他类国际谷物价格涨幅稍低（图2）。本轮粮价上涨期间，国际大米、小麦和玉米的库存消费比分别为32%、25%和28%，远高于国际警戒水平，仅国际大豆库存消费比接近国际警戒水平（表1）。但受农业协定影响，该期间主要谷物的库存消费比呈下降趋势。

## 2.4 2006—2008年上半年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生物质燃料产业扩张、市场投机及一些国家的限制性贸易政策引起国际粮价大幅上涨

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从2006年的70上涨到2008年的130，涨幅为86%，实际价格指数由78上涨至

127, 涨幅为 63% (图 1)。分品种来看, 国际大米价格涨幅较大, 其他类国际谷物价格涨幅稍低 (图 2)。黄季焜等运用 GTAP 模型实证发现该轮上涨主要是由石油价格上涨、生物质液体燃料迅速发展、投机行为及限制性贸易政策等引起<sup>[14]</sup>。此轮粮价上涨过程中, 国际玉米库存消费比低于国际警戒水平, 其他品种的库存消费比仅比国际警戒水平稍高 (表 1)。这可能是由于生物质液体燃料发展对生物质原料的需求增加而导致。

## 2.5 2010—2012 年极端天气、限制性贸易政策和市场投机推高国际粮价

2010 年全球多地频发干旱、洪涝、暴风雪和大火等自然灾害, 全球谷物产量骤减。多国限制粮食出口加剧国际粮食市场供需矛盾。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全球流动性过剩, 市场投机加剧了国际粮价上涨。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从 2010 年的 100 上涨到 2012 年的 141, 涨幅为 41%, 实际价格指数由 100 上涨到 128, 涨幅为 28% (图 1)。分品种来看, 国际玉米和小麦价格上涨幅度较大, 国际大豆和大米价格上涨幅度稍小 (图 2)。此轮粮价上涨过程中, 国际玉米库存消费比远低于国际警戒水平, 大豆接近国际警戒水平, 大米和小麦略高于国际警戒水平 (表 1)。国际玉米价格上涨主要源于供给不足, 而国际小麦价格上涨可能源于市场投机等非供需因素。

表 1 近 60 年国际粮价 5 次上涨特征及原因

时期	总体特征	品种特征	库存消费比	上涨原因
1972—1974 年	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涨幅达 187%, 实际价格指数涨幅达 103%	大米和小麦价格涨幅较大。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名义价格指数涨幅为 299%、157%、135%和 98%, 实际价格指数涨幅为 183%、82%、67%和 40%	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库存消费比平均为 12%、19%、13%和 8%	全球性干旱等自然灾害、中东战争导致的石油危机、苏联的大量进口
1977—1981 年	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涨幅达 61%, 实际价格指数涨幅为 11%	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名义价格指数涨幅为 82%、69%、37%和 3%, 而大米和小麦实际价格指数涨幅在 30%以内, 玉米和大豆实际下降	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库存消费比平均为 20%、23%、26%和 12%	自然灾害、两伊战争导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
1994—1996 年	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涨幅达 42%, 实际价格指数涨幅为 33%	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名义价格指数涨幅为 27%、39%、54%和 21%, 实际价格指数涨幅为 17%、29%、43%和 12%	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库存消费比平均为 32%、25%、28%和 15%	农业协定削减粮食出口补贴导致全球粮食减产
2006—2008 年	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涨幅达 86%, 实际价格指数涨幅为 63%	大米和大豆价格涨幅较大。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名义价格指数涨幅为 113%、70%、83%和 94%, 实际价格指数涨幅为 86%、48%、60%和 70%	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库存消费比平均为 18%、19%、14%和 18%	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生物质燃料产业扩张、市场投机及限制性贸易政策
2010—2012 年	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涨幅为 41%, 实际价格指数涨幅为 28%	玉米和小麦价格涨幅较大, 名义价格指数涨幅为 61%和 40%, 实际价格指数涨幅为 46%和 27%。大豆和大米价格涨幅较小, 名义价格指数涨幅为 33%和 15%, 实际价格指数涨幅为 21%和 4%	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库存消费比平均为 22%、23%、13%和 18%	极端天气、限制性贸易政策和市场投机

数据来源: 价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国际谷物库存消费比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

### 3 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特征及原因

2020 年以来国际粮价呈现新一轮上涨。本部分首先归纳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特征，然后分析引起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的原因。

#### 3.1 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特征

近两年来国际粮食价格持续上涨，2022 年上半年飙升至创纪录水平。据世界银行数据，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自 2020 年 3 月开始，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由 2020 年 3 月的 92 上升至 2022 年上半年的 154。2022 年上半年国际粮价飙升至创纪录水平，3—6 月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分别为 158、165、169 和 160，连续 4 个月超过历史最高位（2008 年 4 月的 156），7—8 月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出现小幅回落，但 9 月至 2023 年 1 月仍处于高位。世界银行的国际谷物名义价格指数与 FAO 的国际谷物实际价格指数呈同步走势。下面仅采用名义价格分析具体品种的差异。

国际粮食价格变化存在品种差异，国际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上涨明显，而国际大米价格并未明显上涨。据世界银行数据（表 2），国际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呈明显上涨。2022 年国际小麦、玉米和大豆名义价格分别为 429.9 美元/吨、318.8 美元/吨和 675.4 美元/吨，比 2021 年分别上涨 36.4%、22.9% 和 15.8%，比 2019 年分别上涨 113.1%、87.4% 和 83.1%。与国际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不同，国际大米价格变化并不明显。2022 年大米国际价格 436.7 美元/吨，比 2021 年降低 4.7%，比 2019 年上涨 4.5%，波动幅度小于 10%。

表 2 2019—2022 年主要谷物国际价格

种类	2019 年/ (美元/吨)	2020 年/ (美元/吨)	2021 年/ (美元/吨)	2022 年/ (美元/吨)	与 2021 年变化/ %	与 2019 年变化/ %
小麦	201.7	231.6	315.2	429.9	36.4%	113.1%
玉米	170.1	165.5	259.5	318.8	22.9%	87.4%
大豆	368.9	406.6	583.3	675.4	15.8%	83.1%
大米	418.0	496.8	458.3	436.7	-4.7%	4.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 3.2 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原因

##### 3.2.1 新冠疫情威胁国际粮食供应和稳定性

新冠疫情影响了粮食安全的四根支柱，即可供应量、获取渠道、充分利用和稳定性<sup>[15]</sup>。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国际粮价的影响包括：第一，疫情封锁导致人工短缺从而影响粮食生产。受新冠疫情影响，不少国家陷入工人短缺的状态，比如棕榈油的主要产地马来西亚就面临缺少工人的问题。美国、英国等国家也都出现过因为工人短缺而不得不扑杀生猪的事件。第二，疫情导致供应链不稳定。疫情一方面冲击生产资料供应而减少粮食生产，另一方面冲击粮食运输链而影响国际粮食供应稳定性。第三，部分国家采取措施限制农产品出口增加了粮价上涨风险。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多个国家先后宣布暂停或限制粮食出口。部分国际媒体炒作加剧了全球粮食市场恐慌情绪<sup>[16]</sup>，从而推升国际粮价上涨。

##### 3.2.2 俄乌战争冲击国际粮食供应与贸易

俄乌战争导致国际粮食主产国减产。乌克兰拥有全球 25% 的黑土资源、3 000 万公顷优质农田、8 000 多万吨谷物产能。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20 年乌克兰小麦和玉米产量占全球产量比例分别为 4.1% 和 3.5%，出口占全球的比例分别为 10% 和 15%。2022 年 2 月俄乌战争爆发，乌克兰农业生产出现劳动力不

足、种子进口难度大等问题，直接影响了乌克兰 2022 年的春播。据 FAO 估计，2022 年乌克兰谷物产量将比 2021 年下降 40.4%，其中小麦产量预计下降 37.9%，以玉米为主的粗粮产量将下降 41.8%（表 3）。由于乌克兰是全球重要的小麦和玉米出口国，该国小麦和玉米产量下降使得国际粮食市场供应趋紧。

表 3 近年乌克兰谷物产量

时间	小麦/百万吨	粗粮/百万吨	谷物/百万吨
2017—2021 年平均	27.2	43.8	71.0
2021 年	32.2	53.4	85.6
2022 年预测	20.0	31.1	51.1
2022 年预计比 2021 年减少	37.9%	41.8%	40.4%

资料来源：FAO。表 6 同。

注：粗粮指除小麦、稻米外的谷物，乌克兰的粗粮主要是玉米。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限制了俄罗斯粮食生产。俄罗斯对农产品种子进口的依赖度较高。据统计，俄罗斯进口玉米种子的播种量占总播种量的比重约为 60%，油菜籽约为 88%，土豆约为 80%，甜菜近 100%。此外，大豆、向日葵等也以进口种子为主。法国、德国、美国是俄罗斯三大主要种子进口国。俄乌战争爆发，德国拜耳公司宣布将停止公司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所有非必要业务”<sup>①</sup>。两家美国粮食巨头（嘉吉和 AMD）也表示“会缩减在俄罗斯的非必要活动，并停止投资”。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持续，未来俄罗斯的作物种子有可能因进口中断而出现短缺。

俄乌战争阻碍了俄乌两国粮食出口。第一，俄乌战争阻碍了乌克兰粮食出口。乌克兰是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的第三大粮食出口国。乌克兰粮食出口主要通过陆路和海路运输。陆路有两条线，一条是经过波兰的铁路前往西欧，另一条是经白俄罗斯的铁路运往波罗的海港口。受波乌两国列车轨距差异以及西方国家对白俄罗斯的制裁的影响，陆路两条线运输不畅。海运主要通过亚速海的别尔江斯克港和马里乌波尔港，以及黑海的敖德萨港。乌克兰通过这两条海运路线出口的粮食占 90%，但俄罗斯已控制或封锁这两条路线。俄乌战争使得乌克兰大量粮食被困，全球粮食供应受限，推高了国际粮食价格。第二，俄乌战争阻碍了俄罗斯粮食出口。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粮食出口国，其中小麦出口居世界第一。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将限制俄罗斯的粮食出口。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施加多项制裁，涉及航运、金融等诸多领域，这使得许多国际买家不敢订购俄罗斯的粮食；另一方面，为保障本国粮食安全俄罗斯禁止出口粮食。比如 2022 年 3 月 10 日俄罗斯通过了一项法令，在 8 月 31 日之前禁止出口白糖和原糖，并在 6 月 30 日之前禁止向邻近的欧亚经济联盟（EEU）国家出口小麦、黑麦、大麦和玉米等。另外，受战争影响，从俄罗斯运输粮食的运费、保险费上涨。2022 年 7 月，俄罗斯和乌克兰就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事宜达成了相关协议，但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黑海粮食倡议”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总之，俄乌战争导致俄罗斯对国际市场的粮食供应减少和运输成本上升，推高了国际粮价。

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不是稻米主产国、出口国和消费国，全球稻谷主产区和供应链受俄乌战争影响较小，而且由于泰国、越南新米陆续上市，国际稻谷市场供给增加，国际大米价格未出现明显上涨。

俄乌战争导致国际农资价格上涨。2021 年，俄罗斯是世界最大氮肥出口国、第二大钾肥供应国和第三大磷肥出口国，白俄罗斯是世界第三大钾肥生产国。自俄乌战争爆发，受经济制裁和黑海贸易路线中断影响，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向其他国家出口化肥的数量锐减，比如 2022 年 3 月 2 日欧盟禁止白俄罗斯钾肥等产品出口至欧盟国家，3 月 10 日俄罗斯暂停化肥出口，3 月 12 日乌克兰暂停所有类型化肥出口等。在此背景下，国际化肥价格急剧上涨。2022 年 3 月，国际氮肥、磷肥和钾肥价格分别为 872.5 美

① 2022 年 8 月 15 日德国拜耳发表声明称“已决定继续向俄罗斯提供必要的农业物资”。

元/吨、938.1 美元/吨、562.5 美元/吨，环比分别上涨 17.2%、25.6% 和 43.6%（图 3）。国际化肥价格上涨，加剧了国际粮食价格上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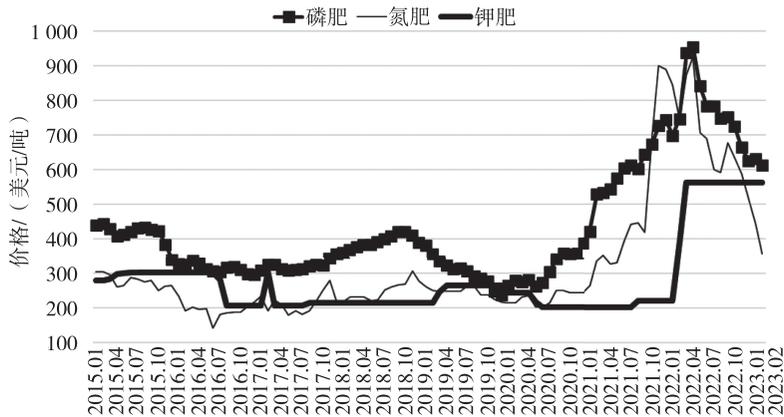


图 3 2015 年 1 月—2023 年 2 月国际化肥价格

注：磷肥价格（磷酸二氢铵，DAP）为美国海湾 FOB 价格，钾肥价格（氯化钾）温哥华 FOB 价格，氮肥价格（尿素）为中东 FOB 价格。

### 3.2.3 全球气候异常导致粮食减产

气候变化成为世界各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威胁。尤其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对全球粮食生产的影响重大。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引起全球降水和温度的异常，出现“旱的旱死，涝的涝死”。Lizumi 等研究发现厄尔尼诺现象会使全球大豆产量平均提高 2.1%~5.4%，但会使全球小麦、水稻和玉米的产量平均降低 4.3%，而拉尼娜现象导致全球小麦、水稻、玉米和大豆四种粮食作物的产量平均降低约 4.5%<sup>[17]</sup>。2021 年全球气候出现两次拉尼娜现象。受拉尼娜现象的影响，部分粮食主产区遭遇历史级别的干旱天气。美国西南部地区干旱已经持续了 20 多年，俄勒冈州、怀俄明州、加利福尼亚州和新墨西哥州等 9 个州自 2000 年以来，就开始出现干旱，而且很可能会发展成为 1 200 多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旱。干旱对美国西部的农业生产造成持续冲击，影响包括玉米、小麦、棉花等一系列作物的生长。受拉尼娜现象的影响，巴西同样遭遇空前旱情，当地玉米、小麦等作物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全球气候异常导致全球粮食供应下降，从而导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

### 3.2.4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投机资本涌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2020 年 3 月中上旬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限调至零，并宣布实施广泛的新措施，包括宣布在“未来几个月”购买至少 5 000 亿美元国债和 2 000 亿美元住房抵押贷款证券。3 月 23 日，“未来几个月”的限期变为无限期，并扩大了证券购买的范围，这些广泛的新措施被称为“无限量化宽松”。该政策自 2020 年 3 月启动，延续至 2022 年 4 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由 2020 年 3 月 3 日的 1.59% 降至 0%~0.25%（图 4 左）。美国狭义货币供应量（M1）由 2020 年 3 月的 4.3 万亿美元飙升至 2022 年 3 月的 20.7 万亿美元，增加了 3.8 倍；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由 2020 年 3 月的 15.9 万亿美元上升至 2022 年 3 月的 21.7 万亿美元，增长约 36%（图 4 右）。美元流动性大增导致大量投机资本涌入国际粮食市场，从而推高了国际粮食价格。全球四大粮商凭借全球垄断地位和雄厚资本实力在粮食市场低买高卖，大肆收割全球粮食财富。2022 年 4 月以来，美国 ADM、邦吉、嘉吉及法国路易达孚四家粮食巨头的利润大幅增长。

本文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在本轮粮价上涨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一般来说，国际粮价波动的影响因素可归为国际粮食需求波动、国际粮食供给波动和热钱波动等方面<sup>[2]</sup>。尽管部分国家使用生物质燃料替代化石燃料，导致粮食需求上升，但该现象并非近年才有，且相比之下数量占比并不大，因此本轮粮价上涨不是由需求因素主导。从供给方面来看，国际粮食供给相对充分。据 FAO 预测<sup>①</sup>，2022 年全球谷物库存消费比为

① 数据来源：<https://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csdb/z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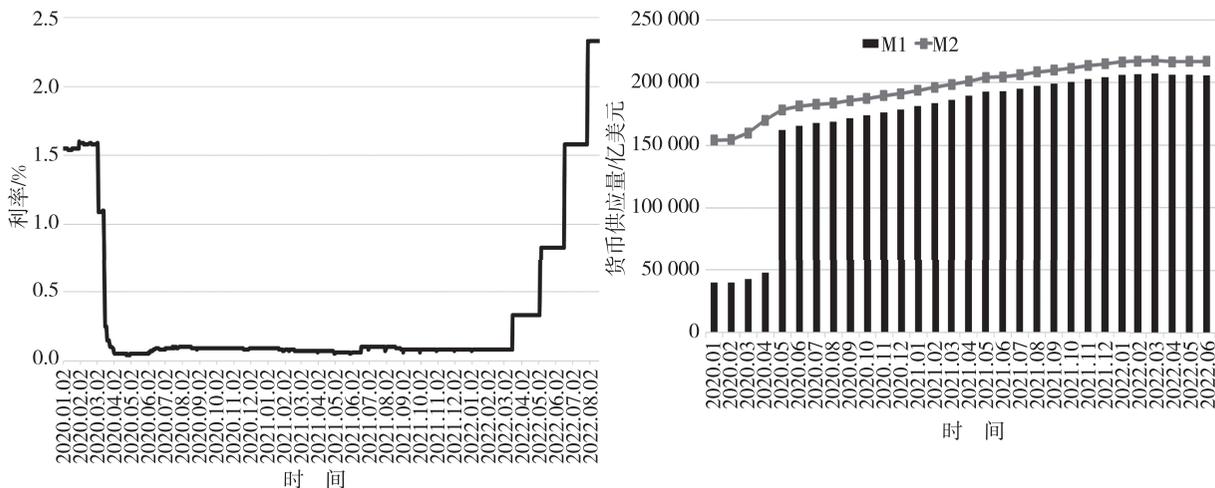


图 4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货币供应量

数据来源：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data.htm>)。

注：货币供应量均经过季节调整。

29.4%，远高于 17% 的国际警戒水平。据美国农业部统计，全球大米和小麦的库存消费比分别为 30.06% 和 26.91%（表 4），远高于 17% 的国际警戒水平，全球玉米和大豆的库存消费比稍低，但仍高于国际警戒水平。这反映出本轮粮价上涨不是由供给因素主导。因此，本文判断，本轮粮价上涨的主导因素是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投机资本涌入国际粮食市场<sup>①</sup>。

表 4 全球主要谷物库存消费比

单位：%

种类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大米	30.97	33.47	33.98	34.22	32.13	30.06
小麦	30.87	31.10	31.92	29.71	27.82	26.91
大豆	20.25	23.13	18.05	18.93	17.37	18.13
玉米	27.42	24.55	23.55	22.03	22.13	22.25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综上所述，国际粮价上涨主要受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全球气候异常和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因素叠加影响，其中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起主导作用。

## 4 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 4.1 从短期来看，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对中国粮食安全影响有限

新一轮粮价上涨在短期内对中国粮食安全影响有限，这是由于一方面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程度低，另一方面导致国际粮价上涨的因素较少涉及中国粮食主要进口市场。因此，国际粮价上涨仅对中国粮食市场带来短期波动。

#### 4.1.1 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程度低

相较于粮食产量，中国粮食进口量较小。2022 年中国粮食产量为 6.86 亿吨，进口量为 1.47 亿吨，进口量占产量的 21.4%。分品种来看，稻谷和小麦进口量分别为 619 万吨和 996 万吨，进口量占产量的 3.0% 和

① 美货币政策是全球粮价大幅波动根本原因。经济日报，2022 年 8 月 16 日第 4 版。

7.2%。进口量较大的是大豆、油料等作物,其中大豆产量为2 351万吨,而进口量为9 367万吨,进口量约为产量的4倍。据《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2》,2010年以来中国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的自给率均值分别为99.3%、98.4%、97.4%和16.7%。由于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的高自给率,国际粮食危机并未对中国粮食安全带来明显冲击<sup>[18]</sup>。党中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为中国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下实现粮食安全提供了制度保障。

#### 4.1.2 中国粮食进口市场相对稳定,较少涉及引起国际粮价波动的市场

中国粮食进口市场相对稳定。如表5所示,稻谷和大米前三大进口市场是印度、泰国和巴基斯坦,大豆前三大进口市场是巴西、美国和阿根廷,小麦前三大进口市场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玉米前三大进口市场是美国、乌克兰和缅甸。中国从俄罗斯、乌克兰进口粮食份额占中国进口粮食总份额较少。中国从乌克兰进口玉米主要是作为饲料粮,俄乌冲突会加快饲料粮进口来源的多元化。尽管美国西南部的旱灾影响了当地玉米、小麦的产量,但由于中国小麦进口量极少、玉米主要用于饲料,美国西南部旱灾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有限。

表5 中国粮食进口前三大市场状况

种类	前三大市场	2022年		2021年	
		数量/万吨	金额/亿美元	数量/万吨	金额/亿美元
稻谷和大米	印度	218.0	7.7	108.9	3.7
	泰国	80.3	4.6	63.9	3.8
	巴基斯坦	119.7	4.5	96.2	3.9
大豆	巴西	5 439.3	373.2	5 814.7	331.7
	美国	2 953.2	191.1	3 229.6	169.1
	阿根廷	364.9	24.2	374.7	21.5
小麦	澳大利亚	572.2	21.0	274.0	8.6
	加拿大	179.0	7.9	254.0	8.1
	法国	170.4	6.1	142.1	4.3
玉米	美国	1 486.4	52.8	1 982.8	55.7
	乌克兰	526.3	16.4	823.4	23.5
	缅甸	19.3	0.6	3.1	0.1

资料来源:《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

#### 4.1.3 中国粮价上涨幅度远低于国际粮价上涨幅度,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突发事件仅造成国内粮食价格短期波动

中国粮价上涨幅度远低于国际粮价上涨幅度。与2021年平均水平相比,2022年1—10月中国小麦、玉米、大豆平均期货价格分别上涨14.6%、5.9%、2.5%,现货价格分别上涨18.5%、2.7%、7.8%,远低于同期国际期货价格(33.7%、20.6%、11.9%)和国际现货价格(38.0%、23.4%、16.8%)的上涨幅度。受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粮食储备政策、进出口贸易调控政策等干预,国际粮食价格对国内的溢出效应相对较小<sup>[5]</sup>。

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突发事件造成国内粮食价格短期波动。以小麦为例,受疫情暴发影响,中国小麦期货价格在2020年1月8—9日上涨超200元/吨。受俄乌战争爆发影响,中国小麦期货价格在2022年2月底至3月初约半个月内上涨超600元/吨。小麦现货价格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也呈现一定上涨,由2022年2月22日的2 883元/吨上涨至3月4日的3 263元/吨。与小麦类似,中国稻米、玉米和大豆期现货价格在突发事件爆发期间呈一定的短期波动。但这些上涨过程的持续时间均较短,之后快速下跌,未形成长期趋势。需要注意的是,国内粮食期货价格波动幅度稍大于现货价格。这可能是由于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突发事件

更容易导致期货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发生变化，而粮食生产企业、贸易商的经营决策行为反应相对平缓。

## 4.2 从长期来看，造成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的因素仍将持续为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压力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造成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的因素仍将持续为中国粮食安全带来风险和挑战。这些因素包括国际化肥价格上涨、极端天气等重大不确定事件、国际粮食安全降至低水平等。

### 4.2.1 化肥价格上涨增加了中国粮食生产成本

化肥属于“粮食的粮食”，化肥价格上涨必然推动粮食生产成本上升。中国是世界化肥生产和施用大国。中国氮肥和磷肥能够自给自足，但钾肥尤其是氯化钾对外依存度高，50%以上依赖进口。2021年中国从俄罗斯、加拿大和白俄罗斯三国进口的钾肥占中国钾肥进口总额的80%以上，仅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进口的钾肥就占钾肥进口总额的54%（图5）。2022年上半年，中国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的钾肥进口合同价格已经确定，且钾肥运输线路均在俄罗斯境内，因此，俄乌冲突对中国钾肥进口的影响当年总体可控。但随着俄乌战争持续，今后情况还不明朗。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不能持续供应钾肥，或者两国钾肥合同价格上升，中国粮食生产成本将被推高，从而对中国中长期粮食保供稳价带来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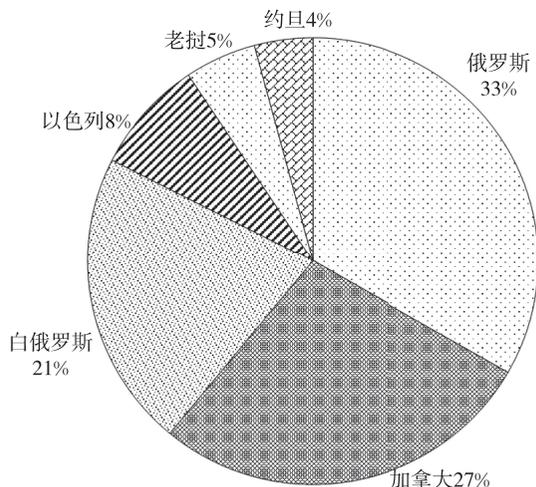


图5 2021年中国钾肥进口国家分布

资料来源：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http://43.248.49.97>）。

注：由于图中数据是四舍五入取整数，故加起来未达到100%。

### 4.2.2 重大事件持续演化将对我国中长期粮食进口带来挑战

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离不开国际市场，这是由中国人均农业资源相对稀缺的基本国情决定的<sup>[19]</sup>。受极端天气、疫情、俄乌冲突、中美战略博弈等重大事件持续影响，预计中长期国际粮食供给将减少。据FAO预测，2022年全球谷物产量比2021年降低1.4%，其中小麦、粗粮和稻米将分别降低0.1%、1.8%和2.1%。大洋洲和欧洲的谷物产量预计减少较多，分别降低14.1%和7.7%（表6）。国际粮食供给减少将导致中国进口难度增加。

表6 全球谷物产量

地区	2020年/百万吨	2021年/百万吨	2022年（预测）/百万吨	比2021年变化/%
亚洲	1 231.9	1 239.8	1 238.4	-0.1
非洲	198.7	202.3	193.4	-4.4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42.6	42.7	41.4	-3.2
南美洲	232.5	227.5	251.8	10.7
北美洲	495.1	495.9	494.7	-0.3

(续)

地区	2020 年/百万吨	2021 年/百万吨	2022 年(预测)/百万吨	比 2021 年变化/%
欧洲	524.1	549.9	507.3	-7.7
大洋洲	50.1	55.2	47.4	-14.1
全球	2 775.2	2 813.2	2 774.3	-1.4
全球小麦产量	776.0	778.1	777.0	-0.1
全球粗粮产量	1 482.3	1 509.6	1 482.8	-1.8
全球稻米产量	517.0	525.5	514.5	-2.1

注：粗粮指除小麦、稻米外的谷物。

各国的限制性贸易措施将进一步给中国粮食进口带来挑战。受疫情、地缘冲突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粮食贸易保护主义。比如，白俄罗斯于 2022 年 3 月暂停小麦粉和荞麦出口；乌克兰 5 月限制荞麦、大米和燕麦出口；其他国家包括阿根廷、阿尔及利亚、伊朗、土耳其、突尼斯和科威特等，限制包括玉米、大麦、面粉、黑麦、植物油、大豆、动物油、盐、糖、番茄、马铃薯、茄子、洋葱等主要粮食和农作物的出口；特别是 5 月 13 日世界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宣布禁止小麦出口，在全球粮食市场引发巨大反响。在此背景下，中国粮食进口可获得性将受到挑战。

#### 4.2.3 国际粮食安全降至低水平增加了中国粮食安全的不确定性

自 2020 年起，全球营养不良人数及发生率均呈上升趋势。2021 年预计全球营养不良人数达 7.02 亿~8.3 亿人，比 2019 年增加 0.83 亿~2.09 亿人。2021 年营养不良发生率为 8.9%~10.5%，比 2019 年增长 0.9%~2.5%。WFP 发出警告，“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饥饿危机”“在短短两年内，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风险的国家从新冠疫情大流行前的 53 个增加到今天的 82 个，人数由 1.35 亿人增加到 3.45 亿人”。据《2021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2020 年超过 23 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 30%）无法保证全年获取充足食物。中度或严重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在过去一年大幅飙升，相当于过去五年增幅的总和。在此背景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粮食安全难以“独善其身”。

此外，西方国家颠倒黑白，指责因中国“大量进口和囤积粮食”助长了全球通货膨胀和食品短缺，制造并利用国际社会特别是缺粮发展中国家的恐慌，把粮食“武器化”“政治化”，大搞地缘战略和阵营对抗。这增加了中国粮食安全的不确定性。

## 5 应对国际粮食市场风险的对策建议

为应对国际粮食市场风险、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 5.1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一是落实“藏粮于地”。落实好耕地保护制度，牢牢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将农田建设成良田。二是落实“藏粮于技”。增加现代种业等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增强农业科技创新，减少种子等关键农业生产要素的对外依存度。三是优化生产布局。发挥区域优势，挖掘各生产要素的增产潜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大豆、油料和玉米等进口依存度高的农产品的产能，缓解结构性短缺，减少对国际大豆、油料、玉米的依赖。四是加强收储调控。不断丰富粮食调控“工具箱”，综合运用轮换吞吐、库存拍卖和增加进口等“组合拳”，实现更高水平下的粮食供需动态平衡。五是开展节粮减损。加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建立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推广粮食产后减损技术，不断提升科学储粮减损能力。呼吁消费者减少粮食浪费，形成节约粮

食的社会氛围。

## 5.2 加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反应

一是构建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监测预警系统,开展全球市场动态与价格形势跟踪分析。密切监测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走势,综合研判新冠疫情、俄乌战争、气象灾害等事件的发展趋势及影响,划分进口风险等级,识别出重大风险点并向相关主体进行预警。二是制定应对国际市场“黑天鹅”事件的应急反应预案。采取多种手段应对突发事件,加强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监管,加强农产品供需双向调节,加强对资本炒作的监管。三是增加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农畜产品上市品种,大力发展人民币标价的粮食期货,吸引国际投资者,进一步掌握粮食国际定价权,规避国际粮食市场风险。

## 5.3 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维护开放与良性的世界农产品贸易格局

一是扩展粮食进口渠道。针对中国粮食进口市场较为集中、粮食进口话语权相对较弱的问题,中国应开辟多元化粮食进口渠道,分散和降低国际市场风险。二是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坚决捍卫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多边主义导向,反对个别成员违背WTO规则、奉行单边贸易政策,倡导通过加强合作、平等对话和协商谈判来解决贸易争端,不实施与WTO规则不符的出口禁止或限制措施。三是积极推动区域自由贸易。扎实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四是加强国际经贸合作。推进与FAO、WFP等国际组织的合作。五是展现大国担当。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和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向贫弱国家提供粮食援助等。

## 5.4 培育跨国涉农企业,增强国际粮食供应链管理能力和韧性

一是引导和支持涉农企业参与全球农产品供应链建设。引导和支持涉农企业扩展海外粮食进口通道,积极建设国际粮食运输通道和物流基地,加大国内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安全运输能力。二是培育国际大粮商,增强国际粮价定价权。国际大宗农产品贸易主要通过大型跨国粮商实现。目前中国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际粮价定价权的大粮商,需加强培育中粮等大型粮食骨干企业,增强粮食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权。三是鼓励国内粮食企业积极进行海外投资。鼓励企业在海外建立粮食生产、加工和储运基地,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增强中国粮食供给韧性。

## 参考文献

- [1] 公茂刚,王学真.国际粮价波动规律及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与对策[J].经济纵横,2016(3):111-118.
- [2] 王学真,公茂刚,吴石磊.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5(11):77-84.
- [3] 韩磊.国际粮食价格对中国粮食价格的非对称传导:基于门限自回归模型的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18,40(2):78-84,127.
- [4] 顾国达,尹靖华.国际粮价波动对我国粮食缺口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2014(12):4-14.
- [5] 肖小勇,李崇光,李剑.国际粮食价格对中国粮食价格的溢出效应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4(2):42-55.
- [6] 丁存振,徐宣国.国际粮食供应链安全风险与应对研究[J].经济学家,2022(6):109-118.
- [7] 朱晶,臧星月,李天祥.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粮食安全风险及其防范[J].中国农村经济,2021(9):2-21.
- [8] 孔祥智,李愿,顾善松,等.俄乌冲突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J].农村工作通讯,2022(10):26-28.
- [9] 李春顶,李娟.全球粮食安全挑战更加突出[J].世界知识,2022(9):19-21.
- [10] 韩冬,钟钰.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市场的影响及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响应[J].俄罗斯研究,2022(3):55-80.
- [11] 张红宇.人口大国如何应对全球粮食危机?[J].现代国企研究,2022(5):88-89.
- [12] 李晓云.关于中国应对全球粮食市场变化的思考[N].农民日报,2022-06-25.
- [13] 钟甫宁.乌拉圭回合以后的中国粮食贸易[J].中国农村经济,1994(3):21-26.
- [14] 黄季焜,杨军,仇焕广,等.本轮粮食价格的大起大落:主要原因及未来走势[J].管理世界,2009(1):72-78.

- [15] LABORDE D, MARTIN W, SWINNEN J, et al. COVID-19 risks to global food security [J]. *Science*, 2020, 369 (6503): 500-502.
- [16] 程国强, 朱满德.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粮食安全: 趋势、影响与应对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 (5): 13-20.
- [17] LIZUMI T, LUO J J, CHALLINOR A, et al. Impacts of El Niño Southern Oscillation on the global yields of major crops [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4, 5 (1): 3712.
- [18] 仇焕广, 雷馨圆, 冷淦潇, 等. 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的理论辨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 (7): 1-16.
- [19] 陈锡文. 切实保障国家食物供给安全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 (6): 4-7.

## The New Round of International Food Price Rise: Characteristics, Causes, Effects and Countermeasures

HUANG Jing XIAO Xiaoyong

**Abstract:** International food prices have fluctuated five times in the past 60 years and have risen again since 2020. The latest rise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levels of food prices and large differences in varietie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COVID-19,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global climate anomalies, and quantitative eas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driven up international food prices. Among them, the 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plays a leading role. Due to China's low depend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food market and the relative stability of the food import market, the rise in international food prices has a limited impact on China's food security in the short term. However, because of the large import of potash fertilizer, major events continue to evolve, and the decline of international food security to a low level, the rise in international food prices will still bring some pressure to China's food security in the long run.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risk of rising international food price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stabilizing domestic production and supply, strengthening the monitoring and warning of global commodity price risk, promot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imports, and cultivating multinational agriculture-related enterprises.

**Keywords:** The New Round; International Food Price Rise; Causes; Effects; Countermeasures

---

(责任编辑 张雪娇 卫晋津)

# 风险规避 VS 风险偏好：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 影响了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吗？

◆ 何邦路<sup>1</sup> 吴秀敏<sup>1</sup> 吉锐<sup>2</sup> 曾洁<sup>2</sup>

(1. 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成都 611130；

2. 四川省农业对外合作交流中心 成都 610041)

**摘要：**本文基于风险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利用 2016—2020 年中国对 72 个国家（地区）的农业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现阶段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既不是单纯的风险规避也不是完全的风险偏好，而是同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呈倒 U 形关系。现阶段中国在大部分国家的农业投资处于风险寻求的“黄金期”（倒 U 形曲线左侧的样本约占 72.78%）。②企业营业收入水平削弱了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间的倒 U 形关系，企业的“趋利”现象使得其对风险的敏感度整体下降，进入和退出东道国市场的速度均有所减缓，放大了风险。③中介机制检验表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通过改变东道国制度质量进而影响中国对其农业直接投资规模。

**关键词：**投资风险；对外农业投资；风险规避；风险偏好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3.09.003

## 1 引言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全面提出了新时期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强调要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构建外贸可持续发展新机制<sup>[1]</sup>。随着开放型经济战略的实施，中国农业国际贸易规模稳步提升，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取得迅猛发展。截至 2020 年底，中国企业对外农业投资广泛分布在全球 108 个国家和地区，在境外设立农业企业 1 010 家，累计投资存量达

收稿日期：2023-04-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升中国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可追溯性的消费决策及应用问题研究”（21BGL161），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直接投资风险识别、测度及预警研究”（SC21A015）。

作者简介：何邦路（1992—），男，陕西安康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国际贸易、对外农业投资，E-mail: blhe2013@163.com；吉锐（1984—），女，四川冕宁人，硕士，研究方向：农业对外交流和促进农产品贸易研究，E-mail: 182419643@qq.com；曾洁（1981—），女，四川宜宾人，硕士，高级农艺师，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农业国际贸易及区域合作研究，E-mail: 87199843@qq.com。

通信作者：吴秀敏（1968—），男，四川成都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E-mail: 727398989@qq.com。

302.19 亿美元<sup>①</sup>。在此背景下,有关中国企业对外农业投资模式的问题引发了学者关注。其中,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与东道国投资风险之间的关系成为众多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起步晚,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较多地进入一些制度环境不成熟、投资空间较少、被欧美等发达国家占据的发展中国家<sup>[2]</sup>。因而,中国“走出去”企业往往会遭遇东道国制度安排缺失所引发的投资风险较高的问题。2015年《纽约时报》发文就中国对外投资风险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章指出“在很多政治和法律制度高风险的国家,中国的影响尤为广泛”“在全世界风险最高的10个国家中,中国在其中5个国家是最大的投资者”<sup>[3]</sup>。国内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导致更易进入制度较差、风险更大的国家<sup>[4-6]</sup>,这显然与传统的投资理论相悖。内部化理论认为,较高的东道国风险使得企业在当地经营的难度加大,巨额沉没成本无法收回的可能性升高,此时对外投资的吸引力自然就越小<sup>[7]</sup>,即对外投资与东道国的市场风险之间存在着负向的相关关系<sup>[8-9]</sup>,类似的观点还有罗伟和葛顺奇<sup>[10]</sup>、杨娇辉等<sup>[11]</sup>。然而 Cheung 和 Qian<sup>[12]</sup>、王永钦等<sup>[13]</sup>持不同观点,他们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缺乏敏感性。显然,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到底是风险偏好还是风险规避,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论。此外,由于投资体量与其他产业存在差距,抑或受到数据可得性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关于东道国投资风险偏好问题的讨论仍集中于整个对外直接投资领域。而少部分已有关于对外农业直接投资风险相关的研究中,较多从定性角度分析中国对外农业投资面临的风险类型<sup>[14]</sup>和防范风险的必要性<sup>[15-16]</sup>,从东道国投资风险角度探讨其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研究尚少。一方面,随着中国农业国际化的快速推进,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将持续走高,兼具投资成本大、周期长的农业投资,具有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的双重属性,易受自然环境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客观上决定了农业投资风险呈现来源广、种类多的特征<sup>[17]</sup>,海外投资过程极易造成损失;另一方面,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是否会出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寻求而对东道国投资风险缺乏敏感。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激增<sup>②</sup>。2016年以来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增速连年下滑(仅2018年短暂回升<sup>③</sup>),那么东道国投资高涨的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投资规模是否存在显著影响?本文尝试回答上述问题,这对于下一阶段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扩大投资规模、推进农业国际化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2.1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

Willett 认为风险是关于不愿发生的事件的不确定性之客观体现<sup>[18]</sup>,Knight 进一步将可度量的不确定性称作风险<sup>[19]</sup>。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金融业使得各国经济深度绑定,为了客观评估各国的征信水平,保证资本国际流通风险整体可控,国家政治风险、经济风险、主权信用风险和对外投资风险等东道国宏观环境风险评级次第诞生。其中,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即为对外投资领域衍生的行业风险评价之一。陈伟和熊启泉将中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划分为政治政策、经济政策、国家法律、国家债务危机和非传统风险五大类<sup>[20]</sup>。汪晶晶等将中国农业投资环境划分为政治与法律环境、经济与对外开放环境、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环境、农业生产环境四方面<sup>[21]</sup>。胡殿毅等将中国在东盟的农业投资环境划分为政治与法律环境、经济及对外开放环境、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环境和农业生产环境四个维度<sup>[22]</sup>。综上所述,评价指标选取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基于东道国的宏观环境因素,从东道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进行考量评价,并将农业产业特征纳入考虑,为本文后续构建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指标体系提供了经验支持。

①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分析报告(2021年度·总篇)》。

② 据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官网数据测算,2013—2020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涨151.37%,年均上涨18.92%。此处将原始月度数据平均化处理得到年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③ 据商务部《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测算,2016—2020年中国农、林、牧、渔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速依次为27.80%、-23.71%、2.19%、-4.81%和-55.78%。本文将农、林、牧、渔业对外投资统一为对外农业投资。

## 2.2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与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

关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目前学术界研究较少,较多的研究集中于东道国宏观环境风险对整个对外投资领域,且研究结论仍存在争议。

争议一:东道国投资风险抑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即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属于风险厌恶型。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是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必要条件,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是吸引外资的重要筹码。当东道国区位优势向不利于外资企业目的寻求的方向演变时,便刺激爆发局部东道国投资风险。随着东道国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升高,制度约束下降,外资企业为东道国非市场机制行为所支付的资金如同不规律的税收,提高了投资的运营成本<sup>[23-24]</sup>,对投资活动产生“摩擦效应”。同时,东道国投资风险伴随政府稳定性降低、行政效率及社会安全下降<sup>[25]</sup>、司法监督失灵,甚至出现资产被征收的可能性,这些因素显然不利于外资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活动开展,即中国向投资环境风险系数过大的国家直接投资的概率较小<sup>[26]</sup>。但也有学者认为,东道国风险对外来投资的影响取决于风险的具体类型或外来企业性质,如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sup>[27]</sup>;相比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对东道国投资风险更敏感<sup>[3]</sup>。上述东道国投资风险对外来投资的抑制影响也可总结为“制度阻碍论”。

争议二:东道国投资风险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即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属于风险偏好型。虽然东道国投资风险伴随政府效能下降导致投资相关审批程序冗繁、投资者时间等待成本上升等问题,但此时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关系网络等非市场机制可以绕开制度环境障碍<sup>[28]</sup>。在此背景下,企业对东道国非市场机制的寻求作为一种次优选择对投资活动发挥明显的润滑作用<sup>[28-29]</sup>,因而制度质量较低的东道国反而更能吸引企业投资<sup>[30]</sup>。同时,制度质量较低会进一步降低东道国政治制度对政府官员参与非市场机制行为的约束,使得投资扭曲性激励被强化<sup>[28]</sup>,类似观点还有 Buckley 等<sup>[5]</sup>、Ramasamy 等<sup>[31]</sup>。Kolstad 和 Wiig 也发现外资对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反而会产生强烈偏好<sup>[32]</sup>,并表现出不规避政治风险的特征<sup>[33-34]</sup>。此外,东道国投资风险上升有可能通过降低社会法律约束,使得外来生产者违法成本降低,进一步放大外资企业在当地投资生产的合法性。上述风险对投资促进的观点也可总结为“制度拉力论”。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东道国投资风险对外来投资的影响均未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东道国投资风险对外来投资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且这种差异可能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即不同大小的东道国投资风险对外来投资的影响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 2.3 盈利水平与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

企业对外农业投资以营利作为主要目的,因此企业盈利水平和投资规模有着天然联系。那么在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关系中,企业是否会因为盈利水平提升产生“趋利”现象而无视投资风险,抑或由于畏惧风险而出现“避害”的现象。由此推断盈利水平可能在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影响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发挥正向或者负向的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假说 H1: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抑制了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有负向影响;假说 H2: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促进了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假说 H3: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与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假说 H4:企业盈利水平在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之间发挥正向或负向的调节作用。

## 3 指标选择、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3.1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存量 (Stock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OFDIA)。本文选择中国企业年度在一国的农业直接投资存量之和(万美元)表征中国年度对该国的农业直接投资规模。该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企业对外农业投资数据库。根据《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分析报告(2021年度·总篇)》,截至2020年底,中国企业在全球108个国家(地区)设立农业企业1010家。由于数据匹配的可得性,本文最终选择72个国家(地区)<sup>①</sup>作为研究对象。2016—2020年,中国在样本区域投资存量规模均超过年度存量总额的75%(2016—2020年依次为75.73%、86.40%、85.60%、86.90%和86.81%),因此选择样本区域国家(地区)研究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代表性。

解释变量: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Agricultural investment risk in host country, AIR)。本文借鉴已有研究<sup>[20-22,35]</sup>,从东道国政治监管、经济金融、社会基础和农业生产经营4个维度构建东道国农业投资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表1),测度东道国农业投资环境稳定程度,用以衡量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大小。

表1 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风险评价指标变量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数据来源
政治监管风险 A1	政治稳定性 (B11)	用以衡量东道国政治不稳定和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恐怖主义的可能性,分值范围-2.5~2.5分,分值越高政府越稳定	WGI
	政府有效性 (B12)	衡量公共服务及行政部门独立于政治压力,制定政策和执行的质量,分值范围-2.5~2.5分,分值越高政府有效性越强	WGI
	控制腐败 (B13)	反映公民对公共权利为私利行使的看法,分值范围-2.5~2.5分,分值越高表明腐败控制力度越好	WGI
	外部冲突 (B14)	衡量现任政府因外国行动而面临的风险,包括非暴力外部压力和暴力外部压力,分值范围0~12分,分值越高外部冲突越小	ICRG
	内部冲突 (B15)	衡量东道国政治暴力,由内战、恐怖主义和内乱三个部分组成,分值范围0~12分,分值越高冲突越小	ICRG
	法律效率 (B16)	反映代理人对社会规则的信心和遵守程度的看法,分值范围-2.5~2.5分,分值越高法律效率越好	WGI
经济金融风险 A2	国民储蓄 (B21)	用国民总储蓄与GDP的比值衡量东道国储蓄水平,比值越大储蓄水平越高	IMF
	税收负担 (B22)	用总税款占商业利润的比例衡量东道国税收负担,比值越大税负越重	DB
	通货膨胀 (B23)	以GDP隐含价格平减指数年增长率衡量通货膨胀,数值越大通货膨胀越严重	WDI
	汇率水平 (B24)	以东道国国家当局确定的汇率或由合法的外汇市场确定的汇率衡量汇率水平,数值越大则本币汇率上升	WDI
	外债规模 (B25)	用东道国债务人在未来一个或多个日期向债权人支付所有负债占GDP的比例衡量外债规模,比例越大外债规模越高	IMF
	偿债能力 (B26)	以东道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例衡量偿债能力,比值越大偿债能力越强	IMF
社会基础风险 A3	社会安全 (B31)	用恐怖主义风险衡量社会安全,分值范围0~4分,分数越高,恐怖主义风险越低,社会越安全	ICRG
	文化冲突 (B32)	用种族、民族或语言分歧而导致的紧张程度衡量文化冲突,分值范围0~6分,分值越大文化冲突越小	ICRG

①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爱尔兰、安哥拉、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巴西、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比利时、波兰、玻利维亚、德国、多哥、俄罗斯、厄瓜多尔、法国、菲律宾、芬兰、冈比亚、刚果(布)、刚果(金)、哥斯达黎加、哈萨克斯坦、韩国、荷兰、加拿大、加纳、津巴布韦、喀麦隆、科特迪瓦、肯尼亚、罗马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美国、蒙古国、秘鲁、缅甸、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尼日利亚、日本、瑞士、塞拉利昂、塞内加尔、斯里兰卡、泰国、坦桑尼亚、突尼斯、乌干达、乌克兰、乌拉圭、西班牙、新加坡、新西兰、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国、越南、赞比亚、智利和中国香港。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数据来源
社会基础风险 A3	就业水平 (B33)	用东道国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衡量失业率	WDI
	城镇化率 (B34)	用东道国城镇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衡量城镇化水平, 数值越大城镇化率越高	WDI
	通信能力 (B35)	用东道国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数量衡量该国通信能力, 数值越大通信越便捷通信能力越好	WDI
	创新水平 (B36)	用东道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衡量创新水平, 比值越大创新水平越高	WDI
农业生产经营风险 A4	农业规模 (B41)	用东道国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例衡量农业规模, 比值越大农业规模越大	WDI
	农业基础 (B42)	用东道国农业原材料进口占商品进口的比例衡量东道国农业基础, 比值越大代表农业原材料进口越多农业基础越差	WDI
	农地面积 (B43)	用东道国农业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表示农业用地水平, 比例越大表示农业用地面积越多	WDI
	自然灾害 (B44)	用东道国自然灾害 (包括洪涝、干旱、病虫害和地震等 20 余种灾害类型) 总受影响人数表示灾害水平	EM-DAT
	劳动力成本 (B45)	用东道国就业人口的人均 GDP 衡量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	WDI
	劳动力结构 (B46)	用东道国 15 岁及以上的人口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比率表示劳动力结构	WDI

注: WGI (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指全球治理指标, ICRG (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指国际国家风险指南,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DB (Doing Business) 指世界营商环境数据库, WDI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指世界发展指标; EM-DAT (Mergency Events Database) 指全球灾害数据库。

具体风险评价方法方面, 本文采用熵权-TOPSIS 法。一方面, 熵权法可以根据待估数据携带的信息熵给出客观权重, 克服了人为给定权重对数据本身造成的估计损失; 另一方面, TOPSIS 法避免了数据的主观性, 不用具体的目标函数和其他相关检验即能够较好地刻画多个影响指标的综合影响力度。通过数据处理后可得 72 个样本分年度的风险得分情况 (分值为 0~1 分), 数值越大代表该国家 (地区) 农业投资风险得分越高, 风险越低, 投资环境越稳定。需要说明的是, 为了便于后文分析, 此处将评估所得的风险得分指数进行逆向标准化处理, 处理后值越大代表风险越大。

调节变量: 盈利水平 (Operating income, OI)。本文用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企业年度在东道国的营业收入之和 (万美元) 表征盈利水平, 进而检验其在东道国投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投资规模间的调节效应。该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企业对外农业投资数据库。

中介变量: 制度质量 (Institutional quality, IQ)。考虑到东道国制度质量可能在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投资规模间发挥中介效应, 本文进一步选取东道国制度质量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检验。具体而言, 选取东道国的监管质量表征东道国的制度质量水平, 监管强度越大, 制度质量越高。东道国监管质量数据来自全球治理指标 (WGI) 数据库。

控制变量: 为了增强模型的稳健性, 本文加入以下控制变量。①外商投资指标 (Foreign investment, FI), 加入外商投资变量旨在考察外资可能对中国农业投资存在的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 外资利用水平可以衡量东道国当局对外资的接纳程度, 外资规模越大表明东道国对外来资本的包容度越高, 长期利用外资使东道国的外资利用环境相对宽松, 因此外来生产主体能够快速拓宽在东道国的投资市场, 这些因素显然有利于中国农业资本在东道国的落地。然而另一方面, 进入东道国的外资和中国对东道国农业投资也形成竞争关系, 从而可能对中国在东道国农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 本文选用东道国的外商投资额 (亿美元) 表示东道国的外资吸纳水平。②环境规制指标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R)。“污染光环”和“污染天

堂”效应表明外来资本对东道国环境污染将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因此东道国的环境规制程度将直接影响外来资本进入东道国的环境门槛，甚至决定生产主体是否能够进入东道国。为此，本文选择东道国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来表征东道国的环境规制水平，清洁能源占比越高表示该国越重视环境保护，越趋向选择清洁能源，进而拥有较高的环境规制水平。③基础设施指标（Infrastructure level, IL）。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是影响外资流入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区位优势指的是生产主体在东道国获得生产要素成本降低、竞争对手薄弱等优势。完善的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可以大幅降低外来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吸引外资流入。一般而言，电力通达程度表示东道国当局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力度，通电率越高表示越多的居民能享受到电力通达带来的生活便捷程度和其他福利效应，为此本文用东道国通电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衡量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水平。④市场准入（Market access, MA）。从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化视角来看，越宽松的东道国市场环境越利于外资进入。本文选用东道国企业注册资产获得资产产权所需的天数表示市场准入成本，天数越高表示准入成本越高，反之则越低。⑤经济发展水平（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D）。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认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外资流入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外资流入和资本流出的比例和规模。本文选用东道国的人均GDP（美元）代表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⑥市场潜力（Market potential, MP）。经济增速越高，东道国的市场活力程度越大，投资潜力越高。本文选择东道国的GDP增速表征东道国的投资潜力。⑦企业数量（Number of enterprises, NOE）。境外注册企业数量（家）可以表征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投资力度，同投资规模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选择年度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在东道国的企业数量作为控制变量之一。

控制变量数据除企业数量来自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企业对外农业投资数据库外，其余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由于本文研究涉及国家较多，原始数据存在少部分缺失，对于缺失数据本文通过线性插值法补齐。同时，为了避免数据量纲差异造成的模型异方差问题，本文对东道国农业投资存量、盈利水平、外商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数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对于部分国家外商投资净额存在负数不能取对数的情况，参考秦朵和宋海岩的研究，将外商投资净值加一个常数使其变为正数然后再取对数<sup>[36]</sup>。由于本文选取外商投资净额作为控制变量的初衷是比较东道国不同外商投资规模对中国投资规模的影响，因此数值正负仅作为衡量彼此之间的大小，不存在其他性质差异。为了尽可能多地保留样本，对于原始数据包含0的指标变量，在其原始数据的基础上加1再取对数，最终获得72个国家（地区）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表2）。

表2 指标变量列表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单位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对外农业投资存量	lnAOFDI	万美元	360	7.786	2.688	0.001	13.468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	AIR	[0, 1]	360	0.485	0.216	0.000	1.000
盈利水平	lnOI	万美元	360	5.464	4.322	0.000	15.155
制度质量	IQ	[-2.5, 2.5]	360	0.181	1.002	-1.720	2.230
外商投资	lnFI	亿美元	360	8.191	0.244	4.605	9.012
环境规制	ER	%	360	33.618	28.856	0.080	97.030
基础设施	IL	%	360	83.151	24.943	17.042	100.000
市场准入	MA	天数	360	6.853	3.227	1.000	17.000
经济发展水平	lnLED	美元	360	8.749	1.499	6.066	11.358
市场潜力	MP	%	360	1.882	4.100	-17.945	10.508
企业数量	lnNOE	家	360	2.660	0.614	-2.303	4.692

## 3.2 模型构建

### 3.2.1 基础回归模型构建

自引力模型运用到贸易分析领域以来,贸易引力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测算国际贸易潜力研究,成为研究贸易潜力最为经典的方法之一<sup>[37]</sup>。贸易引力模型旨在探究区域经济合作对双边贸易情况的影响,而本文将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外化为区域经济合作因素之一,由此贸易引力模型对本文研究有较好的适用性。鉴于此,本文基于风险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构建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影响的基准模型:

$$\ln AOFDI_{it} = \beta_0 + \beta_1 AIR_{it} + \beta_2 control_{it} + \epsilon_{it} \quad (1)$$

$$\ln AOFDI_{it} = \alpha_0 + \alpha_1 AIR_{it} + \alpha_2 AIR_{it}^2 + \alpha_3 control_{it} + \delta_{it} \quad (2)$$

模型(1)为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影响的线性模型,模型(2)为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影响的非线性模型。模型(1)中, $i$ 表示国家, $t$ 表示时间, $\beta_0$ 为截距项, $\beta_1$ 和 $\beta_2$ 为相应的估计系数, $\epsilon_{it}$ 表示随机干扰项。 $AIR$ 表示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 $AOFDI$ 表示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 $control$ 为控制变量集,包括外商投资、环境规制、基础设施、市场准入、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潜力和企业数量。模型(2)中, $\alpha_0$ 为截距项, $\alpha_1$ 、 $\alpha_2$ 、 $\alpha_3$ 为相应的估计系数, $\delta_{it}$ 表示随机干扰项, $AIR^2$ 表示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的平方项。

### 3.2.2 调节效应模型

调节是探讨多种变量间关系的重要方法,若因变量 $Y$ 和自变量 $X$ 的关系随变量 $Z$ 的变化而改变,则认为 $Z$ 在 $X$ 与 $Y$ 之间存在调节效应,此时 $Z$ 被称为调节变量。前文理论分析可知,盈利水平可能影响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与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因此初步判定盈利水平是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与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关系的调节变量,为此构建模型(3):

$$\ln AOFDI_{it} = \varphi_0 + \varphi_1 AIR_{it} + \varphi_2 AIR_{it}^2 + \varphi_3 \ln OI_{it} + \varphi_4 AIR_{it} \times \ln OI_{it} + \varphi_5 AIR_{it}^2 \times \ln OI_{it} + \varphi_6 control_{it} + C_{it} \quad (3)$$

模型(3)中, $OI$ 为盈利水平, $\varphi_0$ 是截距项, $\varphi_1 \sim \varphi_6$ 为相应的估计系数, $C_{it}$ 表示随机干扰项。 $AIR_{it} \times \ln OI_{it}$ 是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一次项和盈利水平的交互项, $AIR_{it}^2 \times \ln OI_{it}$ 是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二次项和盈利水平的交互项。检验调节效应是否存在主要看盈利水平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二次项交互项的系数是否显著,如果回归系数显著则表示调节效应显著。进一步需要通过系数符号的正负性来判定调节效应结果,当交互项和主效应系数符号不同时,调节变量削弱主效应,反之则强化主效应。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模型同时引入盈利水平和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一次项、二次项本身及其交互项,可能造成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进一步对模型交互项进行去中心化处理,以缓解多重共线性对带来的不利影响。

##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面板数据通常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然而由于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将扰动项中的个体和时间异质进行控制,同时将可能导致内生性的误差估计出来,从而提高模型估计结果的一致性,因此本文选择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此外,为消除序列相关和异方差等问题,本文模型估计均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以确保估计结果准确有效。

### 4.1 基准模型

表3模型(1)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的一次项不显著,表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线性关系不显著。进一步,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的二次项,模型(2)中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的一次项、二次项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和中国对

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存在非线性关系。其中,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二次项系数为-9.319,曲线拐点为0.609,位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取值范围 $[0, 1]$ <sup>①</sup>内;当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取最小值0时曲线斜率大于零(11.347),取最大值1时曲线斜率小于零(-7.291),满足变量间存在倒U形关系的条件<sup>②</sup>。上述实证结果对前文假说H1、H2、H3进行了回应,现阶段中国对外农业投资既不是单纯的风险规避也不是完全的风险偏好,而是和风险呈现倒U形非线性关系,倒U形曲线两端东道国风险最小或最大时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均较小,当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适中时,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反而较大。

表3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影响中国农业投资规模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1) lnAOFDI	(2) lnAOFDI
AIR	3.214 (2.844)	11.347*** (4.371)
AIR <sup>2</sup>		-9.319** (4.409)
lnFI	-0.146 (0.454)	-0.036 (0.279)
ER	-0.000 (0.039)	-0.007 (0.043)
IL	-0.077** (0.037)	-0.060* (0.031)
MA	-0.166 (0.130)	-0.173*** (0.056)
lnED	-0.694 (0.691)	-0.677 (0.797)
MP	0.018 (0.018)	0.008 (0.031)
lnNOE	1.623*** (0.172)	1.646*** (0.250)
常数项	16.295* (9.242)	12.831 (8.137)
个体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N	360	360
Within-R <sup>2</sup>	0.260	0.272

注:系数为标准化系数,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表4、表5同。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是其宏观环境稳定性的集中体现,当风险较小时,东道国社会治理体系趋于完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然而,完善的内部制度环境在降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的同时也衍生出较高的环境规制和贸易保护政策等外资进入不利条件,从而使外资准入门槛升高。同时,当东道国内部发展环境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内自有资金相对充裕,对外来资本依赖程度下降,出于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会限制外资流入。当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较小时,中国对外农业投资规模反而较低;随着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上升,东道国制度约束降低,投资环境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升高。一方面,较低的制度约束放松了东道国原有严格的市场管制,企业可以通过非市场机制绕过高制度质量环境障碍,从而简化投资程序,获得提前掌握东道国投资动态的先机;另一方面,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水平升高伴随法律效率下降,企业违法成本降低,扩大了生

① 原则上东道国的风险取值范围不会为极端值0或1,此处是逆向标准化处理后的风险值,逆向标准化后风险的最小值取0,最大值取1。逆向标准化原因前文已经解释此处不再赘述。

② 借鉴Haans等的研究,验证变量间的倒U形关系需要满足:a.变量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b.曲线的拐点位于样本变量的取值范围内;c.当样本量取最小值时曲线斜率为正,取最大值时则为负<sup>[38]</sup>。

产的合法性,促使企业投资规模扩大<sup>[39]</sup>,即在东道国劣势制度反向激励背景下企业存在风险寻求现象。随着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上升,企业对外农业投资规模趋向扩大,即倒U形曲线的左半边。当风险超越阈值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攀升使得社会不稳定性进一步上升,社会秩序紊乱严重,合同履约、交易付款等不确定性增加,同时较高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开始制约投资者的生产安全,冲击企业生产的运输链和供应链,导致企业投资难度加大。随着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再次上升,中国企业对其农业直接投资规模逐渐缩小,存在风险厌恶现象,即倒U形曲线的右半边(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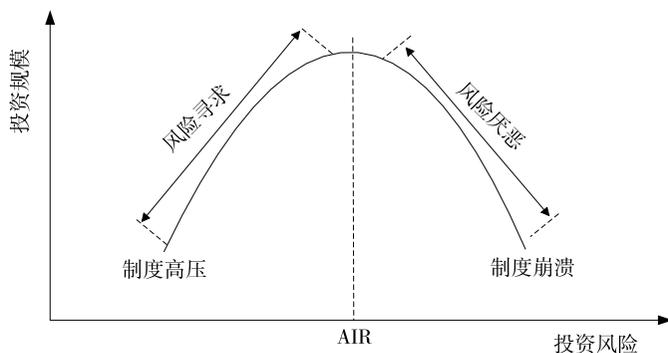


图1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影响中国对外农业投资规模示意图

在本文的360个样本中,未超阈值0.609位于倒U形曲线拐点左侧的有262个样本,占总样本的72.78%。这也表明,现阶段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绝大多数位于投资风险上升促进投资规模扩大的区域,绝大部分农业直接投资活动趋向于风险偏好,仅在少部分的国家(27.22%)农业投资出现规避风险现象。这表明,当前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正处于风险寻求的“黄金期”。既往研究从线性角度考虑东道国投资风险对外来投资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缺陷,忽略了不同风险规模对投资活动造成的“规模”效应,非线性模型估计更贴近实际情况;同时,非线性回归结果也为解释同一投资主体不同时期对同一东道国投资规模差异提供了思路。

## 4.2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尝试改变估计策略,进行稳健性检验。

### 4.2.1 替换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东道国投资风险对外来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本文对被解释变量投资规模滞后一期进行估计。结果显示,表4模型(3)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的一次项、二次项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仍然证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存在倒U形关系,表明基准回归是稳健的。

### 4.2.2 更改样本时间区间

2016年以来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增速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但2018年出现短暂回升,考虑到个别年份波动对模型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将2018年的样本剔除再次进行回归。结果表4模型(4)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的一次项、二次项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仍然证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存在倒U形关系,表明基准回归是稳健的。

### 4.2.3 缩尾处理

由于本文研究涉及较多国家层面的数据,而各国由于发展水平不同,在人均收入、吸引外资等水平方面存在差异,部分国家可能差异极大。考虑到数据可能的异常值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对所有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以降低极端值和异常值的干扰。表4模型(5)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的一次项、二次项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再次证明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 4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影响中国农业投资规模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变量	(3) lnAOFDI	(4) lnAOFDI	(5) lnAOFDI	(6) lnAOFDI
AIR	17.326** (6.917)	12.784*** (3.258)	4.449** (6.531)	0.504* (5.301)
AIR <sup>2</sup>	-14.321** (6.701)	-10.318*** (2.974)	-4.445* (5.544)	-4.475*** (6.242)
lnFI	-0.398 (0.327)	-0.148 (0.554)	-0.310 (1.784)	0.243 (0.239)
ER	0.099* (0.058)	0.017 (0.014)	0.019 (0.037)	-0.004 (0.045)
IL	-0.065 (0.043)	-0.004 (0.017)	-0.049 (0.045)	-0.023 (0.047)
MA	-0.163** (0.068)	-0.124*** (0.047)	-0.155 (0.147)	-0.118 (0.095)
lnED	-0.245 (1.004)	0.664** (0.259)	-0.989 (0.708)	-0.273 (0.563)
MP	-0.011 (0.038)	-0.024 (0.020)	0.034 (0.034)	-0.004 (0.025)
lnNOE	2.283*** (0.704)	2.074*** (0.226)	2.771*** (0.669)	3.608*** (0.904)
常数项	5.640 (10.504)	-4.961 (5.709)	14.641 (18.718)	
个体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检验				20.997 (0.001)
Cragg-Donald Wald F 检验				35.366 (7.030)
N	288	288	360	288
Within-R <sup>2</sup>	0.195	0.257	0.197	

注：Kleibergen-Paap rk LM 检验为不可识别检验，原假设为“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因此当  $p$  值小于 0.1 时拒绝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 检验为弱工具变量检验，要求检验值一般过 15% 或 10% 的临界值则通过检验，本文括号内报告 10% 的临界值。

### 4.3 内生性讨论

考虑到基准模型可能由于遗漏变量及测量误差等因素存在内生性问题，进而导致估计结果偏误，本文参考林毅夫和姜烨的研究，选取内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以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sup>[40]</sup>。表 4 模型 (6) 采用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的一次项、二次项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并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一次项、二次项分别在 10%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再次证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 4.4 进一步讨论

考虑到不同东道国风险规模差异会导致风险对边际投资规模的影响不同，按照投资风险大小，将样本国家划分为高于风险均值的高风险国家和低于风险均值的低风险国家进行异质性检验。表 5 模型 (7) 结果显示，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倒 U 形关系在低风险国家依然显著，但在高风险国家不显著（不显著结果未列出）。可能的原因是，具有较高农业投资风险的国家社会稳定性较低、投资环境恶劣，中国对其农业投资规模较小，因此倒 U 形关系不显著。

考虑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异质性，进而导致其农业投资风险在影响中国农业直接投资规模时存在差异。本文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分类，将样本国家划分为高收入国家（高收

入国家和中高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中低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两类进行异质性检验。表5模型(8)估计结果显示,倒U形关系在高收入国家显著,在低收入国家未表现出显著性(不显著结果未列出)。可能的解释是,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整体社会制度发育不完善,虽然较低的制度约束吸引了外来资本的进入,但较低的社会约束也导致合同违约、资产征收等不确定性事件频发,进而对外来投资者造成损失,因此一正一负抵消了预期的显著性。

为了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影响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机制,本文从东道国制度质量视角检验其是否存在中介机制。表5模型(9)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在1%的水平上和东道国制度质量呈负相关,表明东道国投资风险显著降低了国内的制度质量。模型(10)控制了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后的东道国制度质量的间接影响并不显著。温忠麟和叶宝娟认为,这种情况下可进一步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乘积区间以进一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存在,若乘积区间不包含0则中介效应存在<sup>[41]</sup>。估计结果显示,中介效应乘积区间为[-2.769, -0.544],显著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存在。同时,模型(10)控制了中介变量东道国制度质量后,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直接影响依然显著,表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通过东道国制度质量进而影响中国企业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实证结论也再次印证了前文的论述,即东道国风险影响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效应主要通过改变制度质量来实现。

表5 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影响中国农业投资规模进一步分析估计结果

变量	(7)	(8)	(9)	(10)	(11)
	lnAOFDI	lnAOFDI	IQ	lnAOFDI	lnAOFDI
AIR	22.597*** (7.747)	13.752** (5.808)	-0.573*** (0.160)	12.086*** (4.487)	14.398*** (4.002)
AIR <sup>2</sup>	-26.142** (12.676)	-11.789* (6.883)		-9.782** (4.456)	-11.760*** (3.973)
IQ				0.585 (0.787)	
lnOI					0.103*** (0.028)
AIR×lnOI					-1.550*** (0.266)
AIR <sup>2</sup> ×lnOI					1.302*** (0.262)
常数项	3.300 (22.705)	-9.232 (23.868)	-0.315 (0.616)	12.843 (8.144)	14.667** (7.210)
Bootstrap法检验				[-2.769, -0.54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188	190	360	360	360
Within-R <sup>2</sup>	0.255	0.209	0.150	0.273	0.445

表5模型(11)反映了中国对外农业投资营业收入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Haans等认为,倒U形关系的调节作用会产生曲线斜率的变化和曲线拐点的移动两个方面的影响<sup>[38]</sup>。一是曲线拐点两侧变得更平缓或是陡峭,若解释变量二次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且与主效应符号相反,表示调节变量削弱了倒U形曲线前半段的正向效应和后半段的负向效应,表现为拐点两侧曲线变得更平缓;若解释变量二次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且与主效应符号相同,则表示调节作用会增强倒U形曲线前半段的正向效应和后半段的负向效应,表现为拐点两侧曲线变得更陡峭。二是曲线拐点向左或向右移动。若回归系数 $\varphi_1\varphi_5 - \varphi_2\varphi_4 > 0$ ,则曲线拐点向右移动,小于0则曲线拐点向左移动。

模型(11)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对外农业投资营业收入和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一次项、二次项的交互项

均在 1% 水平下显著,二次项交互系数为 1.302 与总效应系数 (-11.760) 符号方向相反,表明中国对外农业投资营业收入削弱了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倒 U 形关系,使得 U 形曲线两端变得更平缓,假说 H4 得到验证。

当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营业收入较低时,虽然东道国低农业投资风险促进了中国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增加,但企业整体营收却不尽如人意,迫使企业产生了“三思而后行”的观望心理,减缓了市场进入的速度;风险越过阈值后,农业投资营业收入的增加使得企业盈利水平整体上升,此时虽然较高的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破坏了东道国的农业投资环境,迫使企业缩减投资规模,但在超额利润的加持下企业缩小投资规模的速度减缓,即在高风险面前企业出现“趋利”现象,降低了对原有风险的敏感度。长期来看,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营业收入水平提升可以有效缓解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扩大带给中国对外农业投资规模减退的压力。

此外,表 5 模型 (11) 中回归系数  $\varphi_1\varphi_3 - \varphi_2\varphi_4 = 0.518$  大于零,表明曲线拐点会向右移动,即营业收入使得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上升促进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增长的阈值扩大,东道国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抑制的阈值推迟到来。可能的解释是,随着企业营业收入水平的提升,投资有利可图进一步放大了其在东道国投资生产的“风险寻求”效应,扭曲性激励促使企业加快劣势制度寻求,有效降低了企业的投资障碍,节省了投资成本,使得企业抵御风险的韧性增强、对风险的敏感度下降,最终放大了企业的风险寻求空间。

## 5 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本文利用 2016—2020 年中国对 72 个国家(地区)农业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探究了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关系,并考察了企业盈利水平的调节作用,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现阶段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同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呈倒 U 形关系,其极值点为 0.609。初期由于东道国低投资风险伴随的“制度高压”,中国对东道国的农业投资规模整体较小;随着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的上升,在劣势制度反向激励效应下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农业投资规模的提升。这与刘海猛等的研究有相似之处,他们发现中国很多投资流向了风险较大的国家,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投资量大与国家风险高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sup>[42]</sup>。当风险超越阈值后,东道国攀升的农业投资风险通过降低国内制度质量,进而对外来农业投资发挥抑制作用。这与王丽丽的研究结论相似,她认为整体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市场,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规避特征<sup>[3]</sup>。总体而言,现阶段中国在大部分国家的农业投资位于倒 U 形曲线的左侧(72.78% 的样本位于倒 U 形的左侧),因此当前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大部分正处于风险寻求的“黄金期”。本文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既有研究单方面考虑风险对投资的抑制或者促进作用,鲜有在统一框架下讨论同一东道国投资风险不同时间点对同一投资主体投资规模的影响差异,而现实中东道国的投资风险是随时间不断变化的,因此基于非线性模型讨论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农业投资规模的影响更贴合实际。

第二,中国企业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营业收入削弱了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和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间的倒 U 形关系,使得企业进入和退出东道国的速度均相对减缓,并扩大了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促进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提升的阈值,放大了风险寻求的空间;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通过国内制度质量进而影响中国企业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一是客观测度东道国农业投资风险。根据风险定值有针对性地分区域调整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规模或是提升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质量的有效途径。针对农业投资风险较小的高“制度约束”国家,企业可主动调整生产节奏提高环境适应力,以适应东道国合规;针对有“制度拉力”的国家或地区,可以适当扩大农业投资规模;对于严重社会动荡的高农业投资风险国家,可强化风险补偿机制,通过购买海外投资保险等措施平抑风险。二是生产主体要着力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以缓解东道国农业

投资风险对投资规模的抑制作用。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 [EB/OL]. (2015-09-17) [2023-02-12]. [http://www.gov.cn/xinwen/2015-09/17/content\\_2934172.htm](http://www.gov.cn/xinwen/2015-09/17/content_2934172.htm).
- [2] 蒋冠宏, 蒋殿春.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东道国制度重要吗? [J]. 管理世界, 2012 (11): 45-56.
- [3] 王丽丽.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风险规避还是风险偏好 [J]. 金融经济研究, 2018, 33 (6): 117-126.
- [4] 金中坤, 潘镇. 中国为什么会成为高风险国家的头号金主 [J]. 现代经济探讨, 2016 (1): 55-58.
- [5] BUCKLEY P J, CLEGG L J, CROSS A R,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 Int Bus Stud, 2007, 38 (2): 499-518.
- [6] 王淑芳, 闫语欣, 于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 [J]. 世界地理研究, 2021, 30 (4): 781-791.
- [7] BUCKLEY P J, CASSON M. The optimal tim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Econ J, 1981, 91 (361): 75-87.
- [8] WEI S, SHLEIFER A. Local corruption and global capital flows [J]. Brookings Pap Eco Ac, 2000 (2): 303-346.
- [9] 赵赛, 胡必亮. 投资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 (9): 153-158.
- [10] 罗伟, 葛顺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及其决定因素: 基于水平型投资的研究 [J]. 经济学 (季刊), 2013, 12 (4): 1443-1464.
- [11] 杨娇辉, 王伟, 谭娜. 破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制度风险偏好”之谜 [J]. 世界经济, 2016, 39 (11): 3-27.
- [12] CHEUNG Y W, QIAN X. The empirics of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J]. Pac Econ Rev, 2009, 14 (3): 312-341.
- [13] 王永钦, 杜巨澜, 王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 [J]. 经济研究, 2014 (12): 126-142.
- [14] 肖黎. 我国农业海外投资的六类风险与应对措施 [J]. 求索, 2012 (3): 90-91.
- [15] 梁丹辉, 张学彪. 我国农业对外投资研究现状及展望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 (12): 237-243.
- [16] 宋洪远, 张红奎. 我国企业对外农业投资的特征、障碍和对策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 35 (9): 4-10.
- [17] 刘志颐. 农业“走出去”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分析 [J]. 世界农业, 2019 (12): 78-83.
- [18] WILLET T A H. Studies in history, economics, and public law. By th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J]. Econ J, 1902, 12 (46): 240-242.
- [19] KNIGHT F R. Uncertainty and profit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21 (4): 682-690.
- [20] 陈伟, 熊启泉. 中国农业“走出去”面临的国家风险及其防范 [J]. 农村经济, 2010 (12): 13-16.
- [21] 汪晶晶, 马惠兰, 唐洪松, 等. 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中国对外农业投资环境评价 [J]. 华东经济管理, 2018, 32 (6): 85-90.
- [22] 胡殿毅, 李红, 汪晶晶, 等. 基于熵权 TOPSIS 法的东盟农业投资环境评价研究 [J]. 世界农业, 2018 (10): 60-68.
- [23] WEI S. How taxing is corruption on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0, 82 (1): 1-11.
- [24] HABIB M, ZURAWICKI L. Corrup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 Int Bus Stud, 2002, 33 (2): 291-307.
- [25] FREY B S, LUECHINGER S. Calculating tragegy: assessing the costs of terrorism [J]. J Econ Surv, 2007, 21 (1): 1-2.
- [26] 黎绍凯, 张广来, 张杨勋. 东道国投资风险、国家距离与我国 OFDI 布局选择: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J]. 商业研究, 2018 (12): 39-48.
- [27] 王海军. 政治风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东道国与母国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 [J]. 财贸研究, 2012, 23 (1): 110-116.
- [28] 邓富华, 胡兵. 制度约束下东道国腐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门槛效应检验 [J]. 中国经济问题, 2013 (4): 99-108.
- [29] EGGER P, WINNER H. Evidence on corruption as an incentive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Eur J Polit Econ, 2005, 21 (4): 932-952.
- [30] 李晓敏, 李春梅. 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研究 [J]. 东南学

术, 2017 (2): 119-126.

- [31] RAMASAMY B, YEUNG M, LAFORET S.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 [J]. *J World Bus*, 2012, 47 (1): 17-25.
- [32] KOLSTAD I, WIIG A.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 [J]. *J World Bus*, 2012, 47 (1): 26-34.
- [33] 潘镇, 金中坤. 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J]. *财贸经济*, 2015 (6): 85-97.
- [34] 洪俊杰, 黄薇, 张蕙, 等.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解读 [J]. *国际经济评论*, 2012 (4): 121-134.
- [35] 谭砚文, 曾华盛, 李丛希. 中国投资东盟农业的风险评价及国别优先序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7, 38 (8): 76-85.
- [36] 秦朵, 宋海岩. 改革中的过度投资需求和效率损失: 中国分省固定资产投资案例分析 [J]. *经济学 (季刊)*, 2003 (3): 807-832.
- [37] 李晓, 张宇璇, 陈小辛. 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贸易潜力研究: 以最终消费品进口为例 [J]. *南开经济研究*, 2020 (1): 45-69.
- [38] HAANS R F J, PIETERS C, HE Z L. Thinking about u: theorizing and testing u- and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s in strategy research [J]. *Strategic Manage J*, 2016, 37 (7): 1177-1195.
- [39] 白力, 王明生. “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实证研究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2 (5): 66-74.
- [40] 林毅夫, 姜烨. 经济结构、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发展: 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金融研究*, 2006 (1): 7-22.
- [41]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 731-745.
- [42] 刘海猛, 胡森林, 方恺, 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综合评估及防控 [J]. *地理研究*, 2019, 38 (12): 2966-2984.

### Risk Aversion vs. Risk Preference: Does the Risk of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Host Countries Influence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HE Banglu WU Xiumin JI Rui ZENG Jie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ade gravity model of risk expansion, the paper uses the data of China's agricultural direct investment in 72 countries from 2016 to 2020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the host country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risk on the scale of China's foreign agricultural direct invest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①At the present stage, China's foreign agricultural direct investment is neither pure risk aversion nor complete risk preference, but with the host country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risk of the U-shaped relationship. At present, China's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most countries is in the “golden period” of risk seeking (the sampl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inverted U curve accounts for about 72.78%). ②The operating income level of the enterprise weakens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risk of the host country and the scale of China's foreign agricultural direct investment. The “profit-seeking” phenomenon of enterprises makes their overall sensitivity to risk decline, access and exit from host markets have slowed, enlarged the space for risk seeking. ③The mediation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risk of the host country affects the scale of 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by changing the system quality of the host country.

**Keywords:** Investment Risk; Foreign Agriculture Investment; Risk Aversion; Risk Preference

(责任编辑 卫晋津 张雪娇)